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战火中不倒的红旗

第十五册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 难忘的故事

## 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性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以及其他战场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转折。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联合打击威胁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集团，犹如惊弓之鸟，十分恐慌。

由于美、蒋、傅三方存在矛盾斗争，对华北究竟是撤退还是固守，是南撤过长江还是西窜至绥远，敌人处于举棋不定的十字路口。11月4日，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谈对策。

蒋介石鉴于南线兵力薄弱，长江防御缺少兵力，想让傅作义集团南撤，但又担心主动放弃平津，解放军会随势南进，更无力抵抗，因此又想让傅部继续在华北作战，拖住东北、华北解放军，是撤是守，犹豫不决。

在南京蒋介石官邸的小会议室里，蒋介石接见了傅作义。蒋急不可待地对傅作义说：“宜生啊，东北失陷，华北吃紧，你对华北的战局，有何打算？”

傅作义的脑子急剧地转动，他深知自己不是蒋的人，在对蒋的想法不清楚的情况下，说话必须格外小心。故把这个难以说清的“球”又推了回去：“宜生资浅才疏，又居一方，很难估计全局。委员长雄才大略，全局在胸，宜生愿听委员长明示。”

“我意十分明确，撤退华北，防守江南。命你为东南行政长官，率部撤至江南，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的口气十分坚定。

傅作义深知蒋介石的本性，担心南撤后其嫡系部队会被蒋介石吞并，因此不愿南撤，他的基本想法是暂守平津，扩充实力，不得已时率领自己的部队退回绥远老家；是撤是守，他也难下决心。但他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经3个月至半年的休整，也就是要到1949年春季才能入关作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扩充50万兵力，加强平津防御。

想到这里，傅作义谨慎地说道：“委员长，东北失陷，对华北十分不利，但依我个人拙见，华北的战局，还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机的办法。南撤方案，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宜实施。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蒋介石听了傅作义的意见后，其说法与自己也想固守华北的打算不谋而合。经过磋商，遂拟定利用美援和华北的人力、物力扩充军队，采取暂守平津、保住塘沽海港，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

傅作义于11月中下旬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先后撤出山海关、承德、保定等地，将其所辖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旅）共50余万人，部署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其中，以蒋系的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防守北平及其以东廊坊、天津、塘沽、唐山一线；以傅系的1个兵团4个军共17个师（旅）防守北平及其以西怀来、宣化、张家口、张北一线，企图在局势不利时由海上南撤或西退绥远，或各奔西东。

为了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加速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举行平津战役。因此，早

在辽沈战役临近结束时，即1948年11月29日和31日就指示东北野战军一部组成先遣兵团，由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率领先行入关，进至河北省遵化、蓟县地区待机外，主力在沈阳、营口作战结束后，休整1个月左右，即开始入关，协同华北军区主力歼灭傅作义集团，夺取平津等地，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辽沈战役结束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分析判断，在淮海战役即将进入高潮之时，蒋介石为解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集团之围，很可能置华北于不顾，而将华北蒋系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迅速南撤，以确保其长江防线的稳固。为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必须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加以歼灭。

11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的淮海战役，已将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分割，其黄伯韬兵团即将被歼。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中央军委判断位于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南撤的可能性增大，一旦蒋系部队南撤，傅系部队亦必将西逃。中央军委认为，如果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撤退方针，人民解放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等大城市，但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防线，对人民解放军尔后实施渡江作战将十分不利。为此，必须下决心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但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仅以华北人民解放军是无法完成的。据此，中央军委于11月17日明确提出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决定提前调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以防止国民党军南撤。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隔断敌人海上南撤的通路，会同华北军区部队举行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同时，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的消息，造成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在休整的假象，以麻痹敌人。

人民解放军遂行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12个军、1个铁道纵队和特种兵共55个师80余万人；华北军区第2、第3两个兵团等部13万余人，连同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和东北、华北军区能参战的地方部队，总兵力100万余人。为使平津战役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规定，整个战役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入关之前，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林、罗、刘入关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1949年1月10日，又决定以林彪、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中共平津总前线委员会，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隐蔽入关，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为实现抓住傅系部队、拖住蒋系部队，掩护东北野战军入关的第一步作战计划，中央军委确定华北军区部队首先从西线发起攻击，在平绥线拉开平津战役的帷幕。29日，平津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切断其南撤西逃的道路。华北军区第3兵团首先向张家口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12月2日，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

平绥线是傅作义西逃绥远的唯一通道，张家口又是其重要军事基地。华北军区部队这一突然的进攻，切中傅作义的要害。但此时傅作义仍错误地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暂时尚不能入关，华北军区部队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

部行动，因此决心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的进攻，然后以逸待劳，对付东北野战军。遂令其丰台的第35军（欠1个师）、怀来的第104军第258师向张家口驰援；令昌平的第104军主力移至怀来，驻涿县的第16军移至南口、昌平，以确保北平与张家口的交通。至此，傅作义主力被人民解放军吸引到昌平至张家口一线。

中央军委鉴于吸引傅作义主力西移的目的已经达成，即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严密包围张家口地区之敌，确实切断张家口与宣化间敌军的联系，不使张家口敌人向东或宣化敌人向张家口突围；令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急进，切断怀来、宣化间敌军的联系；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由蓟县向怀来、南口急进，包围怀来、南口之敌，隔断北平与怀来敌军的联系。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行进途中于12月5日攻克密云，歼敌第13军1个师，尔后继续南进，准备攻歼康庄地区之敌。华北军区第2兵团于6日到达涿鹿以南地区待机。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又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急令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令第104军主力和第16军由怀来、南口向西接应；并调天津附近地区8个师加强北平防务。第35军东进时，于12月8日被华北军区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向西接应的敌军主力也被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追击和堵击中歼灭。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3兵团解放宣化，并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在此期间，东北野战军主力第1梯队6个军，到达河北省蓟县、玉田、丰润地区。

这时，人民解放军虽已切断傅作义集团西窜绥远的道路，但尚未切断其南逃通路。12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下达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指示平津前线领导人，目前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傅作义率部从海上逃跑，为了不使蒋介石、傅作义定下迅速放弃平津向南逃跑的决心，在目前两星期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采取“围而不打”的原则；对北平、天津等地只作战略包围，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不作战役包围，以待整个部署完成后，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次序各个歼灭之。同时，指示淮海前线在歼灭黄维兵团后，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稳住敌人。还令山东军区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以北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以防傅作义集团沿津浦路经济南向青岛逃跑。根据上述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加紧包围张家口、新保安敌军；东北野战军主力加速向平津地区前进。至12月20日，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并歼其2个军部6个师，完全封闭其西逃南撤的道路，达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预定目的。

至此，傅作义集团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新保安、张家口、北平、天津和塘沽地区，使北平敌军陷入绝境。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抗日，并和共产党有过友好往来。虽在内战中执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失败，逐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失去信心。因此从11月开始，经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争取工作，他几次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但实际上却仍动摇于和、战之间。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一面同傅作义的代表继续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北平；一面加强军事攻势，以增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据此，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决定采取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先打新保安和塘沽两点。

12月21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发起新保安战役，当日扫清外围据点。22日晨开始攻城，经10小时激战，至17时全歼傅作义主力第35军军部及

两个师。敌第 35 军被歼后，张家口国民党军于 23 日拂晓仓惶向北突围，企图逃向归绥。华北军区第 3 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 41 军等部，冒风雪严寒，展开堵击和追击，当晚解放张家口。至 24 日，在张家口东北地区全歼逃跑的国民党军第 11 兵团部、第 105 军等部共 7 个师（旅）5.4 万人，仅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跑。

在津、塘方向，前线指挥员根据塘沽东面靠海，其它三面为河流、盐田地带，不便部队运动和展开，无法对敌形成包围，以及北平、天津国民党军有突围可能的情况，建议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12 月 29 日，中央军委批准先打天津的计划。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集中 5 个军 22 个师共 34 万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和兵器夺取天津。1949 年 1 月 2 日至 13 日，各攻击部队基本肃清敌人。

## 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今北京）是华北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平津战役发起之前，就计划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为此，指示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同时命令人民解放军作好充分准备，以便谈判不成时，以武力手段解放北平。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后，东北和华北解放军的百万大军云集北平城外，使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两个兵团部及其所属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地方部队共计25万人，完全陷入绝境。

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蒋、傅之间矛盾重重：

早在1940年3月，傅作义部取得五原战役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余人的佳绩后，蒋介石发来嘉奖电报，宣布授予傅以“青天白日”勋章。谁知傅作义不领情，发表了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中统、军统和省党部、三青团、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势力，联合起来对傅部进行渗透、瓦解、控制。尤其是随着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对傅的戒心越来越大，傅蒋之间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傅来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人民解放军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50余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

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

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

平津战役发起后，北平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于1948年12月15日派代表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

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表示，只要傅作义集团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可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但傅作义认为尚有实力，仍可继续坚持数月，观望时局的变化，以致谈判未获结果。

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一战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主力第35军，张家口的解放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退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7日派代表偕同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2次谈判。林彪、聂荣臻对他们说：北平、天津、塘沽、归绥各点守军应开出城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并限天津守军于13日前先行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但是，由于傅作义仍持观望态度，此次谈判也未能达成协议。

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了。迫使傅作义急忙派与中共素有往来的华北“剿匪”副总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3次谈判。

在谈判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邓宝珊说，人民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故此次谈判不再包括天津；其他各点守军出城后，应一律解放军化，其驻地一律解放区化。

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为促使傅作义早日定下接受改编的决心，在 1 月 14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同邓宝珊谈判的当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天津一战，人民解放军不仅切断了北平守敌南逃的退路，使之陷入完全孤立覆灭的绝境，同时也打破了傅作义就地固守、以便在谈判中进一步讨价还价的妄想，迫使傅作义在战与和的问题，不得不迅速作出最后抉择。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已比较成熟，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同时命令人民解放军作好充分准备，以便在谈判不成时，以战斗手段解决该城。

16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两项解决办法，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敦促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拖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民主人士及傅系内部开明人士亦作了有力的促进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以恫吓、暗杀、封官许愿等手段极力阻挠和破坏傅作义的和谈行动。蒋介石还派次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到北平，要傅作义坚守北平或南撤。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反复争取，及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并北平开明人士的有力促进，本着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 2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傅作义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派其副总司令邓宝珊到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21 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协议》共 14 条，内容是：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 一、自本月 22 日上午 10 时起双方休战。
-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 22 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 1 月后实行整编。
-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国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 七、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忧。

上述内容刊载于22日当天的《平明日报》。《协议》的第14条未见报，内容是：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此同时，南京蒋介石却一直心惊胆颤，关于北平有可能投共的消息不断传来：“军统局北平站秘密报告：‘平津局势不稳。经查实，傅已两次派人去共区洽谈。据内线密报，傅已打算交出北平……’”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跳脚，但也是无可奈何。

昔日，冷漠、寂静笼罩的中南海里，而今好像吹来了一股报春的和风，吹散了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郁闷，点起了希望之火，也舒展了傅作义将军紧锁着的眉头，露出了笑容。

22日至31日，驻北平的国民党军按协议撤离市区，进至人民解放军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949年北平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200万市民欢声笑语，和生机盎然的春天融为一体，是那樣的和谐，那樣的欢快。31日，人民解放军在群众欢呼声中进入古都北平。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

早在和谈条件尚未全部执行时，傅作义便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亲自去拜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他的这一请求，很快经平津前线司令部征得党中央的同意。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乘飞机从北平抵达石家庄。尔后，改乘汽车当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在傅作义一行到达西柏坡招待所时，周恩来对他们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就和平解放北平的胜利经过进行了畅谈。

当天下午，毛泽东起床以后，周恩来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傅作义将军已经来到了西柏坡，住在后沟，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毛泽东便马上答应去接见傅作义一行。

毛泽东主席身着灰色棉制服、没戴帽子、脚穿圆口布鞋，和朱德总司令一起乘车来到傅作义住的地方，看到周恩来陪同傅作义等已经在门口等候。

一见毛泽东来了，傅作义连忙向前迈了几步，然后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毛泽东的手。第一句话就说：“我有罪！”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认为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负有罪责，应承受人民的惩处，曾请求投案。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首先表示自己有罪。

毛泽东对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说完，就一起走进了会客室。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朱德和邓宝珊、章士钊等互相问候。赞扬他们为人民办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坐下以后，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用掉了。”

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

毛泽东接着说，北平和平解决最好，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

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团圆。如果要打起来，大量的官兵要伤亡，家庭要遭破坏。特别是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打起来，把紫禁城打毁了，闻名古都被破坏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会骂我们的。

说到对傅作义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还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听后不解其意，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这些人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

傅作义听后连连点头。

毛泽东说：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事实上正像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原所属军政人员、干部，在处理上均实行既往不咎、宽大处理的政策，采取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按起义部队待遇，自起义之日起，即为人民解放军干部，即为革命干部，其家庭即为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之家属。这是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 14 条条文中所没有的。

使傅作义尤为感动的是，党和人民政府对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天津等地解放战争中的被俘人员，也一律予以宽大处理，陆续全部释放，送回北平。后来又安排专车把他们转送到绥远，让其参加绥远起义。起义后，有的还被任命为由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

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

傅作义等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疑团顿释，并对他自己及原部属的未来，感到极为快慰和兴奋。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又同傅作义紧紧地握手告别。

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成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八项条件”解决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榜样，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是中共中央战略指导的一大成功，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移交西三门时的小误会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1师从西直门开入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时,标志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人民解放军虽然没费一枪一弹,从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集团手中接管了华北第一大城市,拥有200万人口,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城——北平。但是,在移交西三门防务时,当时的傅作义部的孙英年师还和先期入城担负警备北平城的解放军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

隶属东北野战军的第41军作为入关的先遣兵团,是从塔山阻击战中撤下来,由锦州西边千里迢迢秘密入关的。在康庄和怀来以及张家口等地打了一连串漂亮的追击战之后,全军将士情绪高涨。虽然没白天没黑夜地爬山越岭,长途急行军,但总觉得敌人太熊,仗打得不过瘾。本来想在打北平时打出点名堂,为解放华北立大功。却没想到北平几乎一枪不放就和平解放了,当然更没想到让他们警备北平。这样,从东北出发时满脑子灌输的到华北打响第一枪的念头就泡汤了,自然而然怪话牢骚也就多了起来。

但是,当新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来到驻扎在北平西郊青龙桥41军军部,对他们说:“你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硬仗,还要在新解放的大城市打好警备仗。这次进城可不简单,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听了市长的一席话,大家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又高涨起来,牢骚怪话也就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呢?

这个军太让人放心了。毛泽东曾经赞扬过的不吃老乡一个苹果的部队就是指的41军。

第一支进北平的军队,选择了41军,这无疑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无比信任,也是41军全体将士以其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赢得的崇高荣誉。全军指战员当然兴奋了。

随着与傅作义军队交接防务的时间一天天临近,41军的干部战士也从精神和物质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北平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人们的眼中,占领了北平就像占领了全国一样。进北平,这是比立了大功还光荣的荣誉。如果因为一点闪失,失去了这个荣誉,那是一辈子都要后悔的。因此,从师长、政委到团、营、连干,从普通士兵到炊事员、驭手,都打心眼里重视这次入城。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1月31日清晨,全副美械装备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到西直门城楼下。

城门里,闻讯赶来的京城百姓,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自发地拿着小旗,等着欢迎解放军入城。

然而,站了半天,迟迟不见解放军入城。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解放军不是来了吗?”

“来是来了,就在城外,一排好几里地呢!”

“那干吗还不进城?”

“谁知道呢!”

几个时辰过后,解放军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哗哗地入了城。可是,城门楼子还在傅作义军队手里,守城门的士兵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依然剑拔弩张。

双方僵持起来。

守城的一方，不管解放军进城多少，一概不干涉，但城门坚决不交。

入城的一方，正是士气高涨，哪容得下对方如此狂妄，队伍一摆，轻重机枪架起来，对准城楼，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式。

解放军说：“把城门交给我们！”

“不行！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们不能交。”守门的一方依然坚持着。

实际上到了这份儿，整个儿北平城都交给了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城里 20 多万守军都放下了武器，一个小小的城门楼子，再坚持又能成什么气候呢？

可是，僵局仍然这么摆着。

京城百姓哪见过这阵势，胆小的扭头就走，担心枪子走火，弄个伤胳膊断腿的，何苦呢？胆儿稍大一点儿的，缩着脖子，弓着腰，慢慢从门洞里蹭过来，想瞧个热闹，长长见识。

双方交涉半天没有结果。41 军政委莫文骅只好驱车前往东交民巷，找随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军管会副主任陶铸请示。

莫文骅向陶铸报告了 41 军一个师已入城完毕，但是西直门的城楼死活不交。

陶铸听后，立即找傅方交涉。

很快，对方答复：“我们忙乱了套，一时忘了通知西三门的官兵放下武器。”并说了许多道歉的话。

原来，在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几天，负责北平所有城门防务、维持北平城治安的孙英年师，曾接到过副司令长官郭载阳的一道命令：守西部三门，其它城门交解放军接防，交防后我师出城到半壁店，并继续担任西三门防务，以便进出方便。

31 日早晨，孙英年先后接到西直门、阜城门、复兴门守卫部队的电话，说解放军来接防城门。孙答复：应向解放军说明我们奉命不移交西三门。过了一会儿，三门守卫又来电，说已被解放军包围要缴械。

这下，孙英年有些慌了。他立刻赶到阜成门，一看眼前阵势，脑门儿上的汗珠子就下来了。

孙英年上前向带队接防的一位营长解释，他们是奉命不交西三门的。言外之意，没有接到上峰命令，随便交给解放军，如果怪罪下来，要吃不了兜着走。这位营长向他声明：奉命接西三门城防。口气之硬，足以让孙英年感到，再不交将兵刃相见。

孙英年只好请这位营长一道去向郭载阳请示。当时，郭载阳代表傅作义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孙英年想，等见了郭载阳，是交是守也就清楚了。

到了军管会，陶铸正在气头上，一见孙英年，不等孙张口解释，就厉声责问：

“你还要脑袋不要？为什么不交西三门？”

孙英年赶紧说：“奉郭司令长官命令不交西三门”。

陶铸马上找来郭载阳对质。

郭载阳用手指点着孙英年的脑袋，没好气地说：“我们的人马出城时要你守城门，现在城都空了，不交那三个城门干什么用？”

站在旁边的陶铸噗哧一声笑了，说：“孙师长，你现在已是解放军了，一切行动都得服从命令，赶快通知交城门，迟了真缴你的枪！”

孙英年立即赶往阜成门。同时，电话通知西直门、复兴门即刻交接城防。

接着，陶铸对等待消息的莫文骅说：“对方已答应移交西三门。你们尽快接防完毕，做好以公开的武装力量对付暗藏敌人的准备。”

就这样，西三门傅作义的部队与解放军交接城防。

等到莫文骅返回西直门时，城楼上已经飘起了解放军的旗帜，岗哨也换成佩戴着“平警”臂章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这时，从城里赶来的学生和市民举着彩色的小旗，扭着欢快的大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高呼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口号，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汇聚成胜利的海洋……

人民解放军首先从西直门开进北平城。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

## 活捉杜聿明

淮海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场上依稀传来阵阵枪声。

1949年1月10日黎明时分，驻扎在永城县张老庄的4纵11师卫生所接到老乡报告，说庄头田里有十几个人，鬼鬼祟祟，可能是从前线跑出来的国民党逃兵。

当时，卫生所里只有一支步枪。怎么才能对付那十几个手中有武器的家伙呢？大家一合计，决定采取“红军白手缴枪”故事中的做法，把那些国民党残兵抓回来。于是，队长立即命令通讯员樊正国和崔雪云先前去察看。

到了庄头一看，发现那十几个家伙还躲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樊正国大声喝问：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反问。

“我们是11师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11师送俘虏下来的。”

樊正国狐疑地又问：“你们说一说11师师长叫什么名字？”这时，对方有人向前移动脚步。小樊机警地把枪一抖，喝道：“不许动！”

“我们是才从后方回来的，还不知道现在的师长叫什么。”对方显然在搪塞。

经过短暂的交锋，樊正国和崔雪云心里明白了，这是一伙逃出来的国民党残余。小樊想，回去喊人吧，又怕让他们跑了。抓吧，我们只有两个人，一支枪。而对方带的却是汤姆、卡宾枪和快慢机，清一色的美械装备。但是，从对话来判断，很显然，败兵心虚，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而且又不摸情况，不知对面究竟来了多少人。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立即命令他们：“都举起手来！把枪放在地上，向前走30步！”

同时，故意放高音量对小崔说：“通知2排上去，从侧面警戒。”

这一着果然有效，十几个国民党兵胆战心惊地在两名解放军战士面前，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

把俘虏押回驻地，经初步查问，除了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自谓是军需处长外，其余的都说是当兵的。

卫生队长赵云宏分析，既然有记者、司机，恐怕其中必有官儿吧。否则，这些人怎么能凑一堆儿呢？他立即打电话向师政治部陈茂辉主任作了汇报。陈主任指示，先把那个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司机送到师部来。

此时，旭日东升。设在陈官庄东北十四、五华里的小庄子的师指挥所，开始热闹起来。成千上万的俘虏，像决堤的洪水，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涌过来，越集越多，还有难民和学生，把指挥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上都塞满了，一眼望不到头。俘虏们一个个饿得张着嘴、瞪着眼在等饭吃，看见送饭的挑子一来，立即围上来哄抢，等不上分发。怎么能不急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空投的食品都给当官的吃了，我们好久都没有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

原来杜聿明集团被围陈官庄20天，30万人马没吃没喝。蒋介石曾下令动用国民党空军和民航对围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兵空投补给。按照需要，每天至少要空投30多吨食品。但是，南方的冬天非云即雾，民航机不敢冒险，空军无法起飞。偶然，云开雾散，飞机赶紧起飞空投几十吨。空投无法顺利进行，被围蒋军和随军人员饥寒交迫。空投的物资投下来，争相哄抢。更多的

空投物资被国民党高级军官屯积，却让几十万士兵挨饿。

陈茂辉主任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 11 师卫生所押送俘虏的战士走来。

“怎么现在才押到？”陈主任问。

押送的战士指着门外的俘虏说：“他们怕飞机，路上走走躲躲，好不容易才弄来。”说着向门外站着的俘虏叫到：“进来！”

那个自称“记者”的俘虏，缩着脖子，嘴里喃喃地说：“有飞机！有飞机！先在外边躲一躲吧。”他慌得连门有多高也没注意，一下扑进门来，头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门框上，“哎呀”一声，疼得他两手抱着脑袋直叫唤。

那个所谓“军需处长”穿着一身士兵棉服，外套一件破棉大衣，脸上手上全是黑，很不自然地弯着腰，看起来像个老伙夫。进门后他恭恭敬敬地立正，向陈主任行了个礼。陈主任看着他那狼狈样，叫他坐下，然后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来看了看，放到桌子上，又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开封口，抽出一支递给陈主任，又送一支到自己嘴上。

坐在他旁边的“记者”，大概是被外面嗡嗡叫的飞机吓昏了头，竟忘记这是什么地方，赶忙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恭恭敬敬地给“军需处长”点烟。被他狠狠地瞪了一眼，“记者”才恍然大悟，连忙站起身把火送到陈主任面前。

这一连串的动作，马上引起陈主任的警觉，心里想，这个“军需处长”恐怕不是一般的人物。仔细一端详，发现他的鼻子底下有一小块残余的胡髭，很明显是两撇“仁丹胡子”没刮干净。莫非……

陈茂辉坐下来，开始审问这个“军需处长”。

“你是哪个部分的？”

“13 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

“不对吧。”

“军需处长。”那个“记者”赶忙补充说。

“叫什么？”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 13 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一下！”说完，陈主任顺手给他一个本子。

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掏笔，袖筒托起，露出一截雪白的手臂，上面还箍着一块铮亮的手表。陈主任一怔，手表应该戴在手腕上，哪有箍在手臂上的呢！

“手表戴在手腕上才方便嘛！”陈主任打趣地对他说。

他尴尬地把手表往手腕上拉拉，又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来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再掏，却是一袋美国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钢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呀！”陈主任说，“难道连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写了半天，还是描着原来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坐在旁边的“记者”却有些急了，伸手要替他写，被陈主任制止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是干什么的，不要心存顾虑！”陈主任讲完，拿起放在桌上的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然后对他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不过你不必有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除了战犯以外，是一律宽大的。”

这时，他的头已深深地埋在大衣领里去了，一声不响。

陈主任继续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伯韬被打死了，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黄维本人想混走，也还是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一听“黄维”这个名字，他猛地抬起头愣了一下，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们一定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

他又闷头不作声了。

这时，有人把俘虏的戏班子送来请示处理。这些演员们大概是想表明自己的身份，竟把五颜六色的戏装穿在身上。原来这是郑州的京戏班子。当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被围时，刘峙为了骗取功劳，制造了“徐州大捷”的消息；为了欺骗民众，国民党当局又大加渲染，下令各城市游行祝捷，强迫组织慰问团去慰问。这个戏班子一到徐州，社聿明就弃城逃跑了，戏没演成，反倒成了俘虏。当陈主任把戏班子的琴师叫到屋里问话时，竟把那位“军需处长”吓得一动不动，头也不敢抬。

陈主任见此情景，故意指着门外大批的俘虏，对他说：“你看，那边一堆是你们的士兵，这边一堆是你们校级军官，他们都是自动坦白的。你想瞒过他们是不可能的，还是主动坦白交代的好，不要等着他们来检举！”

他伸头朝外看了一眼，马上又缩了回来。

这时，恰巧敌机在不远处什么地方丢了一颗炸弹，屋子震动了一下，外面也传来人声马嘶。这下可把这位“军需处长”吓坏了，他把脑袋一缩，脸色慌张又有些阴沉地对陈主任说：“这个地方，恐怕不大方便吧！”

“你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陈主任哈哈一笑，说：“我们跟你们打了几十年交道，你们的美国飞机有多大能耐，我们比你们知道的清楚。”

听陈主任讲完，他再没有说话，而是拼命地吸烟，吃牛内干。他的衣服，简直就像一个给养库。一会儿他掏出牛肉干，一会儿又从大衣下边掏出一包香烟，一会儿又从衣袖里摸出点什么来，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

看着他吃点这，嚼点那，陈主任知道他确实饿了。于是，便吩咐人给他端来些小米饭，外带一些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马上狼吞虎咽起来，而“军需处长”只略微吃了一点，又丧气地吸起烟来。

吃罢饭，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便叫人带他到庄头上一个独立的小磨房里去休息。走出门，他立刻把脸埋在大衣领里，匆匆穿过满地都是的俘虏群。一进磨房，他便蒙头大睡。

黄昏时分，突然看押俘虏的战士跑来报告，那个“军需处长”用石头砸破了自己的头，想自杀。陈主任立即随那个战士来到磨房，进门一看，他果然躺在地上，且满脸都是血，以为他死了。忙叫医生来看，结果，只是额角敲破一道小口子。原来，他为了达到装死的目的，用手把流出的那点血涂满了自己的脸，想蒙混过关。

真相查明后，陈主任马上叫人用吉普车把他送往卫生所包扎，并派专人看守。然后，将“记者”带进来，严令他交代“高文明”究竟是谁，否则，马上惩办。

到这时，“记者”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浑身颤抖地说：“我交代！”



我交代！他……他是……杜，社长官！小的是……是他的随从副官。请长官饶命！”

噢，果然是条大鱼！原来这个“军需处长”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号称“小诸葛”的甲级战犯——杜聿明。

为了进一步确认，陈主任叫敌工部门的同志送来一张杜聿明的照片。对照照片：方方正正的脸上，除了没有八字胡，头上多了一圈纱布外，跟照片上的相貌完全一样。

陈主任派人把“军需处长”从卫生所带来后，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杜聿明像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彩地回答：“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至此，淮海战役历时 65 天，取得了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 5 个兵团部、19 个军部、50 个师，非正规军 2 个师、7 个团，战场起义 2 个军部、1 个师。投诚 1 个军部、1 个师。俘虏中将司令长官以下 32.007 万人，毙伤 17.14 万人，投诚 2.86 万人，起义 2.85 万人，共计 55.557 万人。

## 不攻塘沽先打天津决策是怎样形成的？

在平津战役中，先攻克塘沽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曾称：“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1页）但是，毛泽东后来放弃先攻塘沽，改为先打天津。对于这一重大改变，人们的说法不一。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与前线指挥员反复磋商、将帅协谋的结果，而毛泽东的决断是主要的。

在辽沈战役胜利的打击下，继在淮海战役发起的声威震撼下，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蒋介石与傅作义各自作着南撤或西退的打算，后双方妥协为采取暂坚守平、津、张地区，控制海口，以观时变的游移方针。

当时，华北军区野战军的3个兵团，1个在围攻太原，两个在平绥线作战，其总兵力约30万人，仅以此兵力抑留傅作义集团60万人于平、津、唐、张地区而歼灭之，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兵团的投入才行。而东北野战军则刚刚结束了辽沈战役，甫入休整。在淮海前线，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沄、张克侠率两个军的3个半师起义，黄伯韬兵团陷入被围歼之中，蒋介石欲加强长江防御，唯一可抽调的兵力，只有平津地区的蒋系军队24个师，乃至傅系的16个师。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对平、津之敌的可能行动与人民军队的战略利害关系，作了3种可能的估计。即：（一）固守平、津。如敌取此项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二）放弃平、津，傅作义率他自己的几个军退回绥远，蒋系各军撤至南京一带。如蒋傅采取此项方针，对于我们有不利之处，但可不战而得平、津；（三）放弃平、津，蒋傅两系均撤至南京一带。如敌采取此项方针，对我利害各半。并指示东北、华北军队要密切注意平、津、张、塘、锦（西）、葫（芦岛）蒋傅两系军队的动态（1948年11月7日，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等电）。此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蒋傅的动态与我军的作战部署进行着慎审的运筹。1948年11月1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细心修改、补充的致东北、华北两局的长电明确指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织，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这就是平津战役的基本着眼点，就是把歼灭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的任务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因此，先打哪里，或不打哪里，都以有利于实现这一战略目的为依据。毛泽东开始曾考虑以华北第3兵团攻克归绥（今呼和浩特），但“因无打援把握”而停攻；又考虑以华北第2、第3兵团位于绥东，“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也曾同意华北第1、第2兵团先打下太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后“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而推迟进行。此外，也没有同意东北野战军以先遣兵团先打唐山的计划，恐促使北平附近的蒋傅各军进至津、塘、唐线，以主力位于塘沽，即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故毛泽东的基本

方针是：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与华北第2、第3兵团协力将平、津、张、唐之敌一概包围，并在完成围而不打（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与隔而不围（对平、津、通州之敌）之后，再“各个歼敌”，尤其是先歼灭敌两退路上的要害之点——塘沽、新保安之敌。

由此可见，先打塘沽或先打天津，首先是依据有利于就地全歼傅作义集团这一基本点而决定的；当然也将依据战场与战役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而临机决定。对于任何一个战役计划来说，依据新的情况而作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事，一成不变则是少有的。

塘沽是华北的重要海口，也是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撤的唯一海上通道，且有海军舰船停泊在塘沽港口。大沽无码头，轮船不能靠岸，要用小船载人至深海才能登舰。所以，毛泽东于1948年12月11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如果唐山敌在10天内不撤，而你们在10天内集中5个至6个纵队，则最好同时动作，以一部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一部包围唐山，以主力歼灭芦台、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算在望。”据此，毛泽东提出了东线先攻塘沽的构想。

为实现这一构想，毛泽东于12月13日指示林罗刘：“请令后到的三个纵队，全部包围塘沽一点，隔断天津、塘沽间及芦台、塘沽间联系，向天津、芦台两面构筑坚固阻击阵地”。并指出：“如塘沽之敌很多则监视之，不多则相机歼灭之。此举务望迅速，以防平、通、津、唐诸敌向塘沽集中，从海上逃跑。”

12月18日，毛泽东依据谍息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得知：（一）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将集中9万人于塘沽西北之新河，因该地为盐滩不毛之地。故饬令其兵站速储粮3个月，食油300万斤，以备固守，并控制海口；（二）国民党军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三）塘沽的“防务布置”正在加强。《路透社》天津电称：“这一战略性的与非常有价值的地区无疑将为国军提供防守并为外国密切注意。”“外国人则感到塘沽及其出口是天津安全的气压计。”据此，毛泽东对塘沽的攻击问题十分重视。19日18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示林罗：“请你们调查从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能炮击，则塘沽之敌跑不掉。”作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已从战略上的构想，深入到战役实施的有关问题上来了。

12月21日，华北第2兵团发起攻克新保安的作战，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的被歼，引起平、津国民党军新的巨大震动。所以，在林罗还来不及复报炮火可否封锁塘沽的情况下，当日24时，毛泽东又致电林罗指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并提出以下三点：（一）如果不能以炮火完全封锁，塘沽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在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之；（二）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火炮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三）侯镜如亦在塘沽，你们可用送信劝降方式试一试，用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办法。

当日，林罗指示第7纵队：（一）塘沽战役由你们担任统一指挥；（二）盼迅速查明塘沽地区敌人兵力和决定我军参战兵力；（三）盼逼近敌人，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和规定近迫作业的处置。12月23日，林罗决定攻击塘沽时间，拟于12月26日或27日，并报告了中央军委。

25日，林罗致电军委称：“7纵报来塘沽地形情况，转报如下”。7纵就塘沽的地形、敌情、我情及估计，列为6点作了详细报告。其中称：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2纵、9纵及炮兵均须于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至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据我们估计，塘沽为平津敌人唯一退路，如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少（据[俘]供，敌人要守，敌到塘沽后赶筑工事便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反正迟打、早打，其退路步兵是难以切断的，还是以充分准备，细密组织为好。我们当尽一切力量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请指示，保证坚决执行。7纵的这个报告是很重要、很可贵的，它既具体而详细的报告了塘沽前线的重要情况，又提出了在完成充分准备后，“保证坚决执行”的慎重态度与决心，但没有直接提出不打的意见。

毛泽东对7纵的报告很重视，于26日5时电示林罗：攻击塘沽似以推迟至7月上旬为适宜。并指示：请调查大沽、塘沽海面是否不久就会封冻，在封冻以后，是否可以从海上攻击塘沽。当天，林彪致电军委称：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林彪的这个报告，其实仅是他依据个别现象的“判断”，直至27日，“尚无其他材料”证实平津之敌要突围。但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还是重视的。他的原则总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可以应付一切突然事变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在接到林彪26日电后，于当日22时，以军委名义指示林彪：“（一）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二）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则应调杨成武部（华北军区野战军第3兵团，笔者注）甚至杨得志部（华北军区野战军第2兵团，笔者注）参加平津作战。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三）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无疑是对东线预定作战计划的重大改变，对整个战役兵力部署的重新调整。这更加有利于突出和实现平津战役的基本着眼点。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断。这一指示，还体现了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的果断性和灵活性，既在宏观上予前线指挥员以明确的目标，又不限制前线指挥员从实际情况出发机断行事。

依照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认为应有与平、津、塘敌30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有可能我打一处时其它两处同时动作。他遂于12月28日11时向军委建议：为慎重起见，我两杨兵团索性皆开北平附近为好。毛泽东于当日20时，即复示同意。

关于放弃攻击塘沽的问题，林彪一面派参谋长刘亚楼到塘沽前线调查研究，一面向军委提出各种设想方案。28日，林彪将刘亚楼关于两沽地形及作战计划转报军委。刘亚楼在报告中称：两沽地形不利作战，估计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两沽之敌则很不容易，结果得失不合算。我们意见，我军应以时刻准备堵击北平突围之敌，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并开始进行攻击、分割……如平敌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之后，先攻天津之敌。29日11

时,林彪以自己与罗荣桓(罗实际已于28日到达军委所在地西柏坡)的名义,向军委提出了与刘亚楼相同的意见。毛泽东接电后,立即复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此,从毛泽东提出“断然放弃对两沽的攻击计划”,到林罗刘与塘沽前线指挥员的研究结果,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放弃攻塘,先打天津。这是毛泽东与平津前线指挥员依据实际情况,反复磋商的结果,是将帅协谋的又一生动范例。

## 牛拉坦克

1949年初，解放军某部坦克一团一营一连奉命前往天津参加战斗。有辆坦克因为接连出故障，无法和连队同行，只有落在后面一边走，一边修理。当行进到河北省卢龙县桃花村的时候，坦克又出了故障，油也快漏完了，只好停下来重新检修。

桃花村是革命老区，群众对解放军十分热情，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修车期间，坦克班的战士到40里外的火车站找到军代表，说明情况，抬回几十公斤油。这时，坦克也修得差不多了，唯一的问题是电瓶陈旧，点不着火。战士们试着从停着的坡上往下溜车，没溜着。又试着用人推，可这么重个铁家伙，怎能推得动！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老乡们建议：可否用牲口拉着发动。战士们觉得这法子可以一试，可又怕坦克一发动起来，撞了前面的牲口。村长听了，马上说：“你们为老百姓打天下，咱还能吝惜几头牲口！”随即，老乡纷纷把自家的牛、驴、骡子牵来，共有十七八头。

为了避免群众的牲口受到损伤，车长刘永勤担任了拉坦克“队伍”的总指挥。大家先从坦克的牵引钩上拉出一根铁绳，又从铁绳上系出几个分绳，给牲口上了长短不一的套，套钩系挂在分绳上。车长给老乡交待：牵好自己的牲口，防止牲口踩了人，牲口踩了牲口；车一发动着就往两边闪，防备车撞了人畜。一切安排妥当后，车长站到坦克上，左手抱着炮管，右手握着喇叭筒喊道：“现在注意，牵住牲口把套拉紧。”老乡依言而行。车长又喊：“听我口令，一——二——三——走！”一时间，坦克前边响起一片吆喝声，老乡们用绳头、拳头使劲抽打着牲口。尘土飞扬中，坦克终于被拉动了，越走越快，拉出有三四十米，只听“轰”的一声，坦克发动着了。老乡们牵着牲口急闪两边卸了套，战士们也不敢停脚，一直把坦克开上了火车。到唐山后，及时换了电瓶，这辆坦克终于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

## 将计就计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兵力，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强攻天津。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有200多万人口。市内河网纵横，运河从北向南穿过市区的西北部分；海河从西到东穿过市区，把市区一劈两半；此外还有子牙河等共计八条河流穿过市区，把市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市区内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许多高大楼房。日寇占领天津后，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陈长捷于1947年进驻天津后征用10万民工加上军工大建、改建城防工事，构筑了380多个碉堡。小碉堡则多不胜数。环绕全市区有一道深3公尺、宽10公尺、周长50公尺的护城河，护城河外侧是无数的碉堡、鹿砦和雷阵；护城河内侧是一座周高5公尺的土城，上设电网、碉堡。市区的高大楼房全部被改成了火力据点。敌人兵力分布状况为南部弱，中部和北部强。针对这种情况，天津前指果断作出了加强东西两面攻击力量的部署，即以4个纵队从西面和平门和东面民权门突破，东西对进，会师金汤桥，把敌人拦腰截断，分割围歼。这就是刘亚楼司令员概括的“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

总攻发起的时间定为1949年1月14日。

总攻发起前，为了不使我军作战意图和兵力部署被敌察觉，保证作战计划顺利实施，前指除了要求攻击部队注意隐蔽伪装外，还利用多种机会，采用各种办法迷惑敌人。

一天，被我军围困在天津的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利用“谈判”的机会侦察一下共军的防御呢？于是他派毕鸣岐等4人为代表，于1月9日出城去解放军的驻地大南河谈判。企图借机探听我军虚实，拖延我军进攻时间。敌人的良苦用心，一眼就被刘亚楼看穿了。刘亚楼决定将计就计，对众人耳语一番，随后自己走出司令部。

毕鸣岐等人来了，负责接待的解放军让他们坐下，解释说：“我们已经向刘司令员作了汇报，他很重视这次谈判，已经坐车向这里赶来了。”代表们等了差不多有1个小时，司令部里静悄悄的，毕鸣岐等人也弄不清楚这是哪个部队的司令部。忽然，外面喧哗声大起，只听得一个人边往里面走，边用带有南方口音的官话大骂：“这个鬼路，颠得够呛。”司令部里的军官们一闻此声，立即起立。刘亚楼司令员到了！

刘亚楼司令员听取了毕鸣岐代表的话后，斩钉截铁地说：“陈长捷必须要在本月11日8时前放下武器。否则，我们立即攻城。”毕鸣岐回到天津城内向陈长捷报告了谈判情况。陈长捷特别仔细地询问了刘亚楼来的前前后后，认定刘亚楼的司令部在城北面。那么就是说，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城北，他立即调动部队加强了北面的防守。

早有天津地下党把陈长捷的这个新部署报告了天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嘲讽地说：“陈长捷想摸我军的虚实，结果是唱了一出《蒋干盗书》。”

此后几天，陈长捷又几次派代表出城谈判。但是，由于陈长捷无意放下武器投降，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刘亚楼为加深敌人对我军主攻方向在城北的印象，命令炮兵用重炮向天津北城进行试射，又派出步兵从北面进行火力侦察。

终于，和平解放天津无望，只有让大炮说话了。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刘亚楼一声令下，瞬间，数百门大炮惊天动地般响起来，很快把天津城防工事打了个稀烂。炮火一延伸，各处攻击阵地上立即响起了冲锋号声，突击部队喊着杀声开始攻击。

由于刘亚楼巧施妙计，致使敌人产生错觉，大大加速了我军进攻天津作战方针的顺利实施。

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天津守军苦心经营的碉堡工事也无济于事了。仅仅激战29小时，就全歼天津守军13万余人，活捉陈长捷，解放了天津城。



## 战天津

1948年11月，伟大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全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辽沈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军某师经过短暂的休整，于12月1日奉命入关，向华北快速挺进，担任了解放天津的主攻任务。

12月30日，部队到达了天津西部。在这里有一个名叫杨柳青的小镇，它以年画而闻名于全国。但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加上刚解放，小镇上一片凄凉的景象，到处是残墙断壁、碎砖乱瓦，溃敌留下的交通壕及残缺不全的工事、掩体更是杂乱无章地横卧在地上。我天津前线司令部就设立在这里。

部队刚刚住下，主攻师的张师长和李政委就奉命来到了前线司令部。当他们风尘扑扑地跨进临时作战会议室时，屋里早已坐满了各参战部队的指挥员，司令员刘亚楼亲切地和他们握手致意。

会议开始后，刘司令员指着墙上的军事挂图，向在座的各级指挥员们详细地介绍了天津的守敌和市区的情况。他说：“天津的地形是复杂的，它被永定河、子牙河、白河和运河切成许多片段，形成一个广阔绵亘的沿海洼地，这种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给多兵种的大兵团进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加上敌人一年多大兴土木，修筑城防，更增加了我们的攻击难度。在这里有守敌13万人，有380座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以及数以千计的地堡群，有新挖的环城护城河，护城河外密布着数道铁丝网和数以万计的地雷。”刘司令员说到这里，看了大家一眼，提高声音说：“同志们，任务是很艰巨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但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天津就是一座铁城、钢城，我们也要把它攻下来，我们要让陈长捷吹嘘的这个天津大堡垒变成埋葬敌人的大坟墓。”

会议结束以后，刘司令又专门指示张师长和李政委：“要充分作好战术、器材、政治动员三方面的工作。战斗发起后，通过护城河要采取‘打敌反冲击，先分割，后包围；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各个歼灭敌人。”

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烧毁了城周围的房屋、树木，拆掉了全部的建筑，把城周围数里以内变成了一片开阔的无人区。

为了减少伤亡，掩蔽接敌，收到突然出击、一举突破的效果，张师长、李政委和各级指挥员一起，经过充分的研究，最后决定，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秘密的土工作业。一夜之间，挖出了两条长达6公里的交通壕，远端一直伸到离敌人的外围据点三元村几十公尺处。天亮以前，所有的交通壕、战壕都进行了巧妙的伪装。三元村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仅隔一夜我们的部队就运动到了他们的鼻子底下。

在总攻发起以前，我军先进行了一系列清扫敌外围据点的战斗。我主攻师进攻天津的突破口预选在西营门，而三元村又是西营门的屏障，若不拔掉三元村这个据点，部队便无法突破西营门的城防。因此，1月8日下午我主攻师以1个团的兵力向三元村守敌发起了攻击，攻击部队采取了直逼与侧面迂回相结合的战术，在敌人的正面和侧后同时发起了进攻，只用了15分钟即冲入村内，1个半小时解决了战斗，全歼守敌两个加强连。至此，敌人的城防外围据点被我军全部扫清。

1月14日黎明前，所有的攻城部队都静悄悄地进入了阵地，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连空气也像凝固了似的。上午10时正，总攻开始了，千百门大炮一齐轰鸣。大地在颤抖、天空在燃烧。炮弹的出口声和爆炸声，震耳欲聋。顿

时，敌人的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第一线城防工事在我强大炮火的轰击下全部被摧毁了。随着炮火的延伸，我英勇的突击部队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他们像疾风暴雨，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前赴后继，不顾一切地涉过护城河，冲上了天津城头。鲜艳的军旗，在敌人的城防工事前燃起了胜利的火花。

突破口撕开了。我军的后续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城内。主攻师的所有突击部队，迅速以巷战的战斗队形，边打边向敌人的纵深狠狠插去。垂死挣扎的敌人，利用市内街道、巷口、楼房等防御工事进行顽抗。组织一批又一批的残兵败将，向我突击部队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企图阻挡我军的前进。但是，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面前，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其下场只有灭亡。在我突击部队的猛烈打击下，敌人纵深的防御工事，一个一个不是倒塌起火，就是飞上了天，负隅顽抗的敌人不是一批一批被消灭，就是成群成队地做了俘虏。我突击部队势如破竹，激战至第二天拂晓，即突进了市中区，最后在耀华中学消灭了 3000 多顽抗的敌人。

天渐渐地亮了，东方的天空一片彤红，此时，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我各路攻城部队胜利会师了。至此，蒋匪的 13 万人马全部被歼。曾经吹嘘天津城防“固若金汤”、“大天津堡垒化”的陈长捷本人，也垂头丧气地走进了俘虏行列。

天津解放了！多年来受尽压迫、欺凌的劳动人民，从四面八方涌向街头，敲锣打鼓，欢庆解放。天津市里一片欢腾，人人喜气洋洋，鲜艳的红旗，随着歌声到处飞舞、飘荡。它向世界人民庄严的宣告：古老的天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 浴血金汤桥

1948年12月，我人民解放军将天津城团团包围，只待声令下，解放天津。

敌人为了阻挡我军的进攻，想尽了一切卑鄙的办法。他们把天津城外圈的老百姓全部赶走，把村庄烧毁，树木砍光，使城周围几公里内变成了一片开阔的废墟地。无家可归的乡亲们只得拖儿带女、呼天喊地的冒着刺骨的寒风在茫茫的大平原上向北逃难。面对敌人的野蛮兽行，看到饥寒交迫的乡亲们，战士们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们恨不得立刻就解放天津，为受苦受难的乡亲们报仇。

一天清晨，天还未大亮，驻扎在天津东北欢坨庄的我军某部七连的练兵场上，已是热气腾腾、杀声一片了。1班班长刘大虎“以一对三”地在练拼刺刀。正在这时，忽听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指导员文海和战士们跑过去一看，在一个草棚内，一个逃难的乡亲因病饿交加离开了人世，3个未成年的孩子正扶尸大哭。看到这一切，战士们的眼睛都红了。刘大虎把练拼刺的木头枪一扔，抓起冲锋枪喊道：“指导员，快打吧，再不打我受不了了！”“是啊！快打吧！”战士们齐声喊道。看到被仇恨激怒了战士们，文海高声说：“同志们，先记下这笔血债，什么时候打，我们要听上级的命令，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练好兵，争取把团尖刀连的任务争到手。大家快回去抓紧练吧。”说完后他派人掩埋了乡亲，安顿好了三个孩子。回到练兵场上的战士们，又带着新仇旧恨开始了更加刻苦的练兵。

两天后，团里召开了动员誓师大会。面对上千名威武雄壮的战士，团长激昂地说：“解放天津，就是切断敌人北援南逃的喉咙，孤立北平，也是解放整个华北最后战斗的关键……。我们团的任务，就是在兄弟团的配合下，插入敌人的心脏，直达三桥——金钢桥、金汤桥和法国桥，与从西向东突破的兄弟部队会师。尤其是金汤桥，它的左边是敌最高指挥大楼，右边是敌人的警卫部队，它是敌人指挥中心的咽喉。我团准备选派一个能打硬仗的连队组成尖刀连，直插金汤桥，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团长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面前的10多个连队，接着说：“我知道你们都想当尖刀连，我也相信你们都能担负起这个艰巨任务，但名额只有一个。现在我宣布，经团党委认真研究，决定7连为攻占金汤桥的尖刀连，现在请7连接旗。”7连长赵东海和指导员文海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地满脸通红，他俩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台前，代表7连庄严地从团长手里接过了绣有“金汤桥连”4个金黄色大字的战旗。7连官兵为上级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了。上千门大炮同时轰击，敌人的一线城防工事瞬间便被夷为平地。随着炮火的延伸，我军十数个突击连队在炮火的有效掩护下，冲进了敌人的城防要地民权门。7连更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向着金汤桥的方向直插而去。

战斗向着纵深发展，整个天津市笼罩在硝烟和火光中，处处是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垂死挣扎的敌人，利用街道两旁的楼房和街边碉堡，组成了立体的交叉火力，企图阻止我军的前进。面对敌人的顽抗，尖刀7连的勇士们前赴后继，交替掩护，边打边冲，碰到敌人碉堡，就用炸药包送它上天，遇到冲上来的

敌人，就一阵手榴弹消灭它。谁挡住前进的道路，谁就得粉身碎骨。

在敌人的心脏里前进，人多目标大，不易甩开敌人，影响前进速度。为了尽快占领金汤桥，由连长带着 2、3 排掩护，指导员率领 1 排快速前插。在一个街道拐角处，忽然传来了一声口令：“口令，那一部分的？”“咋呼什么，自己人！”机智的指导员，装着敌军官的腔调，唬住了敌兵，就在敌兵一犹豫的瞬间，1 班长刘大虎带着 1 班的战士们箭一样地冲了过去，4 个敌人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做了俘虏。一问，原来这是个暗堡，前面离金汤桥只有 100 多米了。

金汤桥就在眼前了，战士们既紧张又兴奋。只要占领了金汤桥，就等于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上了一把致命的尖刀。在指导员的指挥下，战士们扛起爆破筒悄悄地向敌人的桥头堡摸去。100 米、50 米、30 米、10 米……被我军炮火打蒙了的敌人，畏缩在碉堡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的英雄战士已摸到了桥头堡下。

“轰！轰！”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桥头堡的碎砖烂瓦夹杂着敌人的残肢断臂飞上了天空。爆炸声还没落，一班长刘大虎就一手擎着红旗，一手端着冲锋枪向桥面上冲去，刚刚跑上桥面，他高大的身躯突然一颤，便慢慢地倒了下去，紧跟他冲上去的几个战士也中弹倒下了。原来，在敌人指挥部和街中间，横着一个巨型地堡，里面数挺轻重机枪严密的封锁了金汤桥面和他们刚刚过来的街面，把 1 排压在桥头抬不起头来。必须赶快炸掉它，否则，1 排冲不上去，后续部队上来时还会遭受重大伤亡。面对向外喷吐着火舌的地堡，看着自己亲爱的老班长牺牲在桥面上，年轻的新战士李顺眼睛都快要出血了，他突然间甩出了两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一瞬间，拿起两根爆破筒，一个箭步窜到了地堡的跟前，两手狠劲儿把爆破筒从枪眼里塞进了地堡，只听轰的一声，地堡塌了，李顺的双腿也受了重伤。

谁知地堡太大，里面又分开了间，所以只炸掉了向桥的一间，而另一间里的机枪仍然疯狂地嚎叫着，封锁着街面，后续部队仍然被压在后面不上来。李顺忍着剧痛，拖着受伤的双腿，艰难地爬了过去，将另一根爆破筒塞进了另一间地堡里。可是还没等他回过头来，咚地一声，敌人把爆破筒又推了出来。

爆破筒在脚下滋滋冒着青烟，他不顾一切地抓起爆破筒又狠狠地捅进了地堡。狡猾的敌人这次早有了准备，他们抓住爆破筒的另一端，也使劲往外推，这样推进推出三次，爆破筒就要爆炸了，在这生死关头，英雄李顺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斗的胜利、革命战士的责任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力量，他用胸膛抵住爆破筒，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往里一顶，随着敌人的倒退，爆破筒在地堡里爆炸了，英雄李顺头部负了重伤，静静地躺在地上。

就在爆破筒爆炸的同时，指导员率领全排战士向桥面发起了冲锋，他从 1 班长刘大虎手里接过了红旗勇猛地冲上了金汤桥，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桥上。大楼上的敌人见丢失了金汤桥，便组织了疯狂的反扑，敌人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叫喊着冲了过来。指导员文海在激战中不幸胸部中弹，他扶着旗杆，吃力地站在那里，大声喊到：“同志们，守住阵地，保住红旗！”说完便牺牲了。面对冲上来的敌人，身负重伤的 1 排长号召大家：“同志们，为了胜利，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保住红旗！记住指导员的话，给指导员报仇。”

“给指导员报仇！”

战士们怀着满腔的复仇怒火，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了敌人。敌人嚎叫着丢下大批尸体逃了回去。

敌人越到了垂死的时候，就越疯狂。他们不甘心就这样失败，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但在全排战士的英勇反击下，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敌人的第五次反扑开始了，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了1个连，而1排的人更少了，弹药也快打光了。战士们都抱定了誓与金汤桥共存亡的决心，上好了刺刀，准备与敌人拼命了。正在这时，在敌人的背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成片地倒下了。啊！兄弟部队从西面冲上来了，这时，连长也带着2、3排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冲了过来。

“冲啊！”尖刀连的战士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跳起来，扑向了溃乱的敌人。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敌人在红旗下纷纷跪下投降。大楼指挥部的敌军官们也在我强大火力的打击下，无可奈何地举起了双手。

拂晓，枪声停息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金汤桥上，那面布满硝烟、弹孔的战旗在阳光的照耀下，迎风招展。

## 爆破英雄董学瑞

1949年1月中旬，解放天津外围据点——范家堡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突击部队被敌人阵地前沿的数道铁丝网挡住了。“爆破组，跟我上！”连长大喊一声，抱起炸药包带领爆破组冲了上去，但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封锁下，第一次爆破失败了，连长和爆破手也牺牲了。这时离上级要求的“天亮前一小时扫清自己突击道路上的障碍”的时限只有半小时了。指导员决定组织第二次爆破。

“指导员，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4班战士董学瑞首先请求道。

“指导员，把任务交给我吧！”

“指导员，让我去，我要替连长和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去爆破。指导员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把任务交给董学瑞。他握着董学瑞的手，严肃地说：“去吧！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放心吧，指导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完成任务。”董学瑞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跳出战壕向敌人的铁丝网猛扑过去。在同志们的火力掩护下，他利用弹坑，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把炸药包塞在了铁丝网下，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第一道铁丝网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趁着未散的硝烟，董学瑞又快速地送上了第二包炸药，眨眼间敌人的第二道铁丝网又被撕开了。敌人被炸急了眼，集中了所有火力朝这个缺口打来，密集的火力顷刻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火网。面对着凶猛的火力，董学瑞一咬牙又抱起了第三包炸药。

“等一等”，指导员看他满身大汗，呼呼地喘着粗气，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顺手抢过了炸药包：“小董，掩护我！”说着就要冲上去，董学瑞急了，一把拉住了指导员，含着眼泪说：“指导员，不能啊！连长没了，连队就靠你了，还是让我去！”没等指导员允许，便从指导员手中夺回了炸药包，第三次冲了上去。

随着第三包炸药的爆炸，敌人苦心设制的铁丝网只剩下了最后的两层，但是就在董学瑞回撤的路上，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巨大的气浪，把他掀出了几米远，右臂也负了伤。指导员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他抱了回来，急忙给他包扎好伤口。他忍着疼痛，笑着说：“指导员，不要紧，快给我炸药包。”指导员心痛地说：“小董，你负伤了，还是换别人吧。”董学瑞一听说要换人，急的霍地一声站了起来：“我有经验了，还是我去！”趁指导员不防，抱起炸药包又飞快地冲了上去。指导员知道，现在再劝阻已经来不及了，便连忙组织火力进行掩护。

在密密的弹雨中，董学瑞抱着炸药包跑几步、爬几步，早已忘记了疲劳和伤痛。当离铁丝网还有30多米的时候，突然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右腿，他猛然跌倒在地，指导员正要组织抢救，只见英雄董学瑞咬着牙，用尽全力的力气，靠着一只胳膊一条腿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去，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迹。

“轰！”一声巨响，敌人的最后两道铁丝网飞上了天。前进的道路打通了，同志们一个冲锋，就攻进了范家堡，全歼了守敌。这时，离天亮刚好还有一小时。

总攻开始了，突击部队沿着董学瑞用鲜血开辟的通道，顺利地冲进了市区，董学瑞看着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天津城上空，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 战火中不倒的红旗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城南敌人的城防工事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突然，战火中敌人的城防上竖起了一面耀眼的红色战旗，她迎风招展，像一把胜利的火焰，鼓起了战士们的豪情壮志，壮起了战士们的英雄虎胆，她招唤着攻城的勇士们快去消灭敌人争取胜利。突击中的战士们看到了他，冲得更猛，打得更狠了。

战旗下，一位个头不高的年轻战士，正在一面保护着红旗，一面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扫射、投弹。这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就是我军某部2连的于新生。

于新生出生在江西省庆丰县的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参加红军的父亲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受尽了酷刑，最后惨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当时，母亲带着幼小的新生匆匆赶到了监狱。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小新生借着小小的铁窗透进的一丝惨淡的亮光，看到骨瘦如柴的父亲躺在黑暗的角落里奄奄一息，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看到他们母子，父亲用手抚摸着小新生的头，艰难地说：“孩子，别哭，要记住我是怎么死的，给我报仇。”说完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刻骨的仇恨，支持着于新生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着活了下来。为了活命，15岁不到的于新生被迫去给一家姓蔡的地主当长工，受尽了凌辱和折磨。1942年，国民党匪军到处抓壮丁，黑心的地主，为了保住他的狗崽子，便把于新生冒名顶替蔡有福强行送到了国民党军队。未成年的于新生出了狼窝又入虎穴，在暗无天日的反动军队里以蔡有福的名字度过了牛马不如的4年。直到1947年锦西杨杖子战斗时，才被我军解放过来。

悲惨的身世，坎坷的经历，加上黑暗的旧社会给予了他太多的屈辱和痛苦，使于新生年轻的心麻木了，冰冷了，除了满腔的仇恨别无它念。是人民军队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给了他真挚的阶级情、战友爱，使他真心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幸福，他那颗冰冷的心也渐渐复活了。特别是连里的诉苦大会，听到战友们的血泪控诉，才使他懂得了天下的穷人都有一本血泪帐，在会上，他泪流满面地向大家倒出了一腔的苦水：“我不叫蔡有福，我是被地主老财冒名顶替抓的壮丁，我的真名叫于有福，爹妈的愿望是让我能有福享，可是黑暗的旧社会，那有穷人的福啊！只有到了咱们人民的军队，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才获得了新生。从今往后，我改名叫于新生了。”经过两年多的革命教育和数次战斗的锻炼，于新生明白了许多的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要有打倒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

总攻前，上级批准了2连为团突破天津城防的“尖刀连”，于新生所在的8班担任了尖刀连的“突击班”。8班的战士，人人都为争当旗手而争执不休，最后在考虑到任务的艰巨和每个同志的具体情况之后，连里决定把红旗交给老战士张成。于新生虽然没有当上旗手，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战斗中奋勇杀敌，争取第一个登上城墙。

战斗开始了，在我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尖刀连的勇士们跳出战壕，向敌人的阵地猛扑过去。张成负伤倒下了，班长马少华立刻接过了红旗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于新生紧跟在班长的身后向前飞跑，刚刚冲了十几米，班长也负了伤。紧急关头，于新生一个箭步冲上去，接过班长手中的红旗冲在了最前面。

炮弹在身边不断地爆炸，子弹像密集的雨点在身旁飞来窜去，他丝毫没有畏惧。复仇的烈火和必胜的信心，交织在于新生的心头，变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不顾一切地一口气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敌人的数道铁丝网被我军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地横在面前，于新生看准一个缺口高擎着红旗冲了过去，但是，零乱的铁丝网绊住了他的双腿，挂住了他的身体，使他进退不能。敌人的机枪子弹一排排在他四周打起了朵朵泥花。同志们也跟着红旗向这边冲来。关键时刻，他的脑海里又闪现出了凄惨的童年，父亲的惨死，地狱般的蒋匪军生活，父亲临死时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孩子，记住我是怎么死的，给我报仇。”他大吼一声，挣脱了铁丝网的纠缠，迈动着流满鲜血的双腿，跨过了四丈多宽的护城河，冲到了围墙下。围墙上的敌人发现了硝烟中的红旗，立刻投来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地下嗤嗤地冒着白烟，于新生迅速抓起回敬给了敌人，手榴弹在敌人的头上方爆炸了，吓得敌人连滚带爬地逃窜了。于新生趁机登上了围墙，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敌人的城防工事上。

红旗迎着战火高高飘起。在她的指引和激励下，尖刀连的勇士们在短短的5分钟内，便冲过了300多米的开阔地，突破了三道铁丝网和四丈宽的护城河，扫清了沿途的一切障碍，狠狠地插进了敌人的城防。

敌人为了夺回这块阵地，向这不到50米长的缺口疯狂反扑，数十名敌人，在交叉火力的掩护下，嗷嗷叫着冲了过来。孤身作战的于新生，沉着迎战，在敌人离他只有20多米远的时候，突然把10余颗手榴弹快速扔向了敌群，同时端起缴获的机枪向敌人猛扫，敌人丢下了大片尸体逃了回去。

第一次反扑被打垮不久，副班长带领两名战士冲上来了，他们抓紧收集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准备迎击敌人更疯狂的反扑。

第二次反扑开始了，敌人的炮弹在红旗周围不断爆炸着，突破口上成了一片硝烟弥漫的火海。在炮火的掩护下，胆怯的敌人像蜗牛一样慢慢地向突破口爬来，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挥舞着手枪在督战。敌人越来越近了，于新生抬手一枪，打死了督战的敌军官，随后他们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了回去。

两次反扑被打垮之后，接着敌人又发起了更加猛烈、疯狂的第三次反扑，它们增加了火力、兵力，改变了攻击的方向，从北面向于新生他们迂回过来。于新生和副班长他们密切配合，奋勇迎击。手榴弹打完了，就用机枪、步枪射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这时，后续部队突破了前沿的火力封锁，冲了上来，突破口扩大了，敌人在遭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后，狼狈逃窜了。

主力部队向纵深发展了，于新生又高举起布满弹孔和硝烟的战旗跑在了连队的最前面，指引着尖刀连向城区冲去。



## “二 三”上火线

1949年1月14日上午9时30分，正当海滨城市天津上空的浓雾渐渐散去时，“轰轰轰”几百门大炮一齐怒吼，上千发炮弹呼啸着划空飞去，倾泻在城墙上、保垒上、暗堡上。顿时，浓烟滚滚，泥土飞扬，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的序幕。

猛烈的炮火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击部队迅即跃出阵地，潮水般涌过护城河，直奔突破口。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开了突破口，尖刀连的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头。不料，担任这次攻打天津的1纵各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二道防线，向纵深推进的时候，前进受阻。

原来，先头部队1师和2师，在进至永明街、邢家胡同、清化寺街东口一带时，因地形不熟，都挤在了不到1公里的正面上。有的战士迷了路，有的插乱了建制。而此时的敌人则凭借其坚固的工事、地堡进行顽抗，向我军反击，先头部队前进受阻。与此同时，被人民解放军炮火炸昏了头的国民党守军，一清醒过来，马上组织炮火向突破口猛轰，致使沟通纵队和攻击部队的电话线时常中断。面对如此严重情况，纵队首长有些担心。

在这关键时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曹里怀，果敢地向李天佑司令员和梁必业政委请求，由他进城到一线指挥。考虑到整个作战部署，李、梁二位纵队首长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报请天津总指挥部同意后，曹里怀立刻带2名警卫员1名参谋奔向第一线去。在奔向城区的途中，周围不时地落下敌人的炮弹爆炸，曹里怀冒着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危险，疾速前进。

赶到城内1师指挥所，曹里怀了解到，前面的部队序列完全乱了，电话兵架线跟不上，情况不明，师的指挥员甚至团的指挥员已不能全部掌握部队，他们只能分头跟上1个团或1个营，在枪林弹雨中指挥部队继续前进。“看来，在师指挥所也不能解决问题。”曹里怀心想：“必须到火线上去！”于是，曹里怀叫上师长贺东生，坐上配属的装甲车，奔向火线。一路上，枪声炮声爆炸声不断，流弹乱飞，不时地击中装甲车“叮当”乱响。坐在装甲车里的曹里怀风趣地对贺东生说：“老贺，真没想到这玩艺儿还管点儿用，这可比你光膀子冲锋强多了。”

装甲车沿着横竖不齐，道路狭窄的天津街道行进着，突然，装甲车在一个胡同口停下了。一打听，原来在前面的丁字形路口，敌人的一个地堡，正发疯似地用机枪封锁着光秃秃的街面，受阻的战士们躲在胡同口气得嗷嗷叫。曹里怀迅速察看了周围地形，感到硬冲不行。忽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何不在这里发挥一下装甲车的作用！主意已定，曹里怀对战士们大声说：“我来给你们开路！”随后，他跳上装甲车钻进车里，指挥着装甲车朝街中心敌人的地堡冲去。

顷刻，地堡里敌人的机枪失去了刚才的威风，受阻的战士们紧随装甲车其后，在装甲车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发起冲锋，非常利索地消灭了这股顽敌。

战斗结束后，当战士们欢呼着，从装甲车旁走过继续向前冲去时，无不向它投去感激的目光。有几个调皮的战士还用枪托敲着车身喊道：“同志们，该让你们指导员给你们记一功。”

坐在车里的参谋和警卫员都被逗乐了。

一个警卫员跳下车，笑着对他们说：“什么指导员？车里坐的是203首长。”周围的战士们一听，“啊！”不由地惊讶起来。

随后，边追赶前面的队伍边喊道：“同志们，刚才坐装甲车的是 203 首长。快冲呀！”

这时，深受鼓舞的指战员杀敌劲头倍增，更加勇猛地循着枪声激烈的方向冲去……

## 诱惑

天津守敌的城防被突破后，我军某连沿着城区街道边打边向纵深冲去。经过激烈的争夺，占领了一座大楼。

“刑东、董长富，你二人留下看守这所大楼，防止敌人的破坏，等待后续部队上来。”

连长下达命令后，便带领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从激烈的冲击战斗中突然停下来，站在寒风刺骨的黑夜里，俩个人不一会就冻得索索发抖，被汗水湿透的棉衣，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碴，像一件笨重的盔甲。特别是刑东的那只光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时更像猫抓鼠咬似的难受。

原来，部队在突破护城河的时候，五班战士刑东的两只脚陷在了烂泥里，使劲一拔，掉了一只鞋。当时，子弹在身旁乱飞，炮弹不断在周围爆炸，正是突破城围的关键时刻，半秒钟也不能耽搁，刑东只好拖着一只光脚跟着部队爬上围墙，突破敌人的城防冲进了市区。

天亮了，借着晨曦的亮光，他们看清了这是一幢民用大楼。房间里的东西零乱不堪，但靠墙角的食品柜里却整齐地摆放着数盒美国牛肉罐头和几大包饼干；在走廊边的衣帽架上，挂着几件漂亮的棉大衣，靠墙边摆放着好几双棉鞋，特别是有一双黑色的高筒皮靴，在晨光中反射出诱人的亮光，好像在对他俩说：“傻瓜，天这么冷，又没人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吃、不穿呀？！”

对于激战了一天多，又在天寒地冻中饥肠辘辘地披着冰冷的湿棉衣，光脚站在水泥地上几个钟头的刑东和董长富来说，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

“不！绝不能违犯纪律，上级号召我们入城后要做到秋毫无犯，不能因为我们而败坏了解放军的名声。”

刑东心里想着，抬头看了一下董长富，这时只见董长富把头偏向了一边，故意不去看这些东西。

“老董，忍耐一下吧，这点苦算什么，等会儿就会有人来替换咱们了。”刑东轻轻地对董长富说。

晌午了，还没有人来换，俩人的肚子饿得乱叫。寒冷加饥饿折磨得两人眼前阵阵发黑。

“老邢，饿不饿？”董长富轻声问道。

“早就饿了。”刑东老实地回答。

“吃点东西吧？”董长富建议道。

“吃什么？老董，咱可不能犯纪律啊！”刑东惊奇地看着董长富说。

“吃什么？你身上不是带着干粮吗？”董长富不太高兴地说。

邢东知道自己错怪了人家，忙陪着笑脸说：“站岗吃东西，不是违犯卫兵守则吗？”

忍着饥寒，两个人又不言不语地站了两个多小时。阵阵腹痛折磨得董长富实在受不了了，于是他出了法子说道：“老邢，我脸朝里吃，你站在我背后，把我遮住，我吃完了，你再转过来吃，我给你遮住。”

邢东一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董长富背过身，掏出冻得硬梆梆的大饼子，香甜地啃了起来。邢东故意把两臂张开一些，把他遮住。

临近黄昏，团长带人来接管大楼时，看到邢东站在水泥地上的光脚变成

了黑紫色，手里拿着冻硬了的大饼子，心里全明白了，他十分激动地拍了拍邢东的肩膀，又心痛地对他们说：“快下去吃点热东西，好好休息吧！”

## 活捉陈长捷

天津城防被攻破了，我攻击部队像一支支利箭，从四面八方城区纵深勇猛插去，激烈的巷战开始了。

我军某英雄连，在连长的率领下，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边打边冲，拂晓时分接近了敌军警备司令部。

敌警备司令部设在中原公司的大楼里，大楼周围密布地雷和铁丝网，敌人在楼下、楼上及大楼对面安放了十几挺机枪，组成了立体交叉的火力网，严密地封锁了我军的前进道路。

面对敌人的密集火力，从正面进攻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连长当机立断，命令2、3排从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1排由付连长率领迂回到大楼的西北角进行侧面进攻。经过逐街逐巷的激烈拚杀后，1排接近了大楼，并出奇不意地发起了攻击。敌人发现了我1排的意图后，集中火力立即封锁了1排的前进道路，付连长负伤倒下了，1排被压在路旁的土堆后抬不起头来，只有付排长邢春福和战士付泽国、王义凤冲进了院里。敌人拚命地向他们射击、扔手榴弹，他们3人利用院里的墙角、沙袋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拚杀，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他们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迫使大楼里的50多个敌人缴械投降。

“小王、小付，敌司令在“忠烈祠”的地下室，快跟付排长打进去。”冲上来的排长高声命令道。

两个小战士一听，高兴极了，他们一手抓枪，一手抓着手榴弹，跟着副排长冲进了“忠烈祠”。

副排长守住了门口，掩护小付、小王打了进去。他俩一阵手榴弹，消灭了敌人的警卫，穿过一条小走廊，冲进了地下室。那是个20米见方的大厅，里面乱七八糟，零乱不堪，满地撒落着文件、纸张、手枪皮套……桌子上乱堆着罐头、酒瓶……”那些敌军官看见冲进来的付泽国、王义凤早吓得缩成一团。

“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解放军优待俘虏！”

两个人高举手榴弹大声喊道。

有个带眼镜的家伙哆哆嗦嗦地先举起了手，沙哑着声音哀嚎道：“别打！别打！我们投……投降！”

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以后，小付问道：“谁是司令官？”问了几声也没人吭声。在他们举着手走出地下室时，一个副官模样的敌军官在经过小付身边时，向他递了个眼色，轻声地说：“司令在里边。”这时副排长也来到了地下室。

送走了这群俘虏，副排长带领他俩拐向了左侧的地下室。地下室的门口挂有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掀开门帘往里看，走廊很黑，不知有多深，但隐隐地听到嘈杂的声音，他们三人想都没想，就相互掩护着冲了进去。

“别动！举起手来！”

微弱的灯光下，7个敌军官颤抖着举起了双手。其中一个肩扛中将军衔的胖子，有气无力地从一张大沙发上慢吞吞地站了起来。他们料定这就是敌警备司令陈长捷了。

“弟兄们，我们缴枪。最好请一位军官来，我们交代一下，通知部队不

打了。”一个敌军官无可奈何地说道。

“付泽国，快去通知排长！”副排长命令道。

小付刚出庙门，就遇见了副营长。副营长听了他的汇报，就同他一起来到了地下室。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我军的枪口下，不得不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命令——投降。

## “ 这些中国人真厉害 ”

1949年1月14日，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4天，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天津守敌陈长捷发起总攻。至15日下午，天津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解放了。

天津人民无比欢欣鼓舞，隆重集会庆祝这座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欺凌的港口城市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会上，担任天津警备司令的解方将军，更是激动万分。他无限感慨地向集会的广大军民高声宣布：“天津已回到人民的怀抱，那种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此情此景，又把解方将军的思绪带回到18年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将罪恶的黑手伸向华北，进而企图侵占整个全中国。1931年11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日租界秘密招募训练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汉奸武装便衣队，妄图在天津密谋策动一场暴乱。

当时，任天津保安队特务总队主任解沛然（解方当时用名），是一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很有才干的爱国热血青年，年仅23岁，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早已义愤填膺。

当他得知“汉奸便衣队定于今夜暴动”的消息后，在征得国民党天津市政府主席和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赞许和支持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赞同用武力回击日本侵略者策动的武装暴乱。根据大家的意见，解方果断地决定：在日租界周围实行戒严。他解释说：“这样既可以防止汉奸预先潜入租界里应外合，乱中渔利；同时也能将战场隔离出来，减少对百姓的伤害。”在他的指挥下迅速进行了战斗部署。

11月8日夜，汉奸便衣队在日本侵略军的火力掩护和督阵下，兵分三路，从日租界向河北省和天津市政府、公安局冲来。这时，早已埋伏在各要道路口的天津保安队官兵，马上给以迎头痛击。双方战至拂晓，汉奸便衣队没能越过伏击阵地一步，突袭阴谋没有得逞，只得龟缩回日租界。次日上午，汉奸便衣队在日军装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向保安队发起冲击。由于保安队没能组织起有效火力致敌于死地，虽经多次击退汉奸的进攻，但总是溃而复攻，战斗越打越激烈。见此情景，解方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当汉奸便衣队再次发起冲锋时，解方命令保安队暂不还击，准备好手榴弹。等敌人冲到距保安队阵地只有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时，解方一声令下：“打！”密集的手榴弹立刻飞向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四处逃命。紧接着，解方又命令保安队集中机枪、步枪火力追歼逃敌。汉奸便衣队死伤惨重，进攻的势头迅即减弱。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汉奸便衣队在日本侵略军的策动下又多次与解方等人指挥的保安队交锋，每次均以汉奸便衣队的溃败而告终，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没有得逞。

“天津事变”中解方等人指挥的保安队表现出的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机智勇敢和顽强的拼杀精神，大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抵抗侵略者的爱国热情，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推行丧权辱国的卖国政策，接受了日军提出的屈辱条件，使“天津事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屈辱妥协而告结束，为日本侵略军攻取北平、天津，进而夺取整个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天津事变”结束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常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老前辈”自居的土肥原贤二，在评价这次交战时说，他有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学生打教师打得这么狠；二是没有想到天津保安队能作这样的抵抗。日本国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也不无佩服地说：“这些中国人真厉害！”



## 调转枪口打老蒋

那是 1948 年 12 月下旬，淮海战役进入到后期，王枫在华北军区后备第 4 师 13 团 5 连任排长。当时，部队为了把国民党军队中受压迫最深的俘虏兵争取过来，壮大我军实力，上级命令他带着 4 名班长担负教育训练 105 名俘虏的任务。由于这些俘虏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反动宣传的毒害较深，对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半信半疑，教育任务很艰巨。

经过几天的观察，王枫发现这些俘虏兵虽然都穿着一样的士兵服装，但他们中间有一个岁数较大的姓照的俘虏兵，一举一动对其他人影响很大。于是，王枫决定先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开始，他思想很顽固，一连找他谈了几次都进展不大。后来，王枫他们从其他俘虏兵的口中得知，老照当兵前也是贫苦出身，是被生活所迫才替蒋匪军卖命的。弄清了老照的身世，做工作心里就有底了。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老照因腿部伤口感染，疼得直冒汗。这里距离连部有 10 多里地，王枫要帮他到连里找医生，他却带搭不理地一拐一拐自己走了出去。追上去想扶着他走，他不让，用手一挡差点摔倒。王枫趁势把雨衣披在他身上，背起他就往连里走。

这下，他有点受不了啦，硬是不让背。王枫力气大，没让他下来。大约走了五六米，他趴在王枫身上哭开了。王枫说：“老照，你也是久经沙场的人啦，哭啥？”越说老照越动感情，哭了一路。

到了连里找来医生，王枫亲自帮他擦洗，雨停后，又背着他返回驻地。老照感动得流泪不止。王枫看火候到了，就趁热打铁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讲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和为人民翻身求解放谋幸福的宗旨。老照思想疙瘩慢慢解开了，他呜咽着说：“王排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同志，我也是个排长，怕暴露身份才找了身士兵服穿上了，这百十个俘虏都是我的弟兄，我愿意带领他们参加革命部队，谁要是不调转枪口打老蒋，我跟他没完！”

“老照，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扛起枪杆打敌人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走留自愿。”

听了王枫的话，老照深深地点了点头说：“王排长，我懂了，还是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

经过 3 个月的教育训练，特别是老照用自己思想转变的现身说法，配合工作，俘虏兵的思想转变得很快。尽管王枫他们再三讲明有愿意回家的，发足路费，保证安全，但大家的态度都很坚决，一致要求参加解放军。老照当然是第一个报的名，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还立了大功。

## 夺机起义

1948年12月16日，俞渤等同志从南京架机起义投奔解放区，这已是国民党空军8大队第二架飞机起义了。第一架是刘善本。当时，张雨农在8大队任中尉副驾驶。面对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他也在寻思今后的出路。年底回上海，遇到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孙志刚同学，他反复对张雨农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个为人民服务的清廉政府，也要建设空军，你们去了，有的是事情做。”他的劝导，坚定了张雨农驾机起义的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张雨农与任永荣、黄友寿等商定了起义计划。

1949年2月3日中午，他们按约来到机场。此时停机坪上静悄悄的，只有一名背着步枪的士兵在100米外游荡。他们迅速接近飞机。任永荣、黄友寿站在士兵和张雨农之间，装作闲谈挡住士兵的视线。机警的黄文刚站得较远一点，他双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掏出手枪来。张雨农面向铜锁，从机上掏出大号螺丝刀，把它插进锁环里，使劲地撬了几下，然而，这把锁出乎意料地结实，纹丝不动。他便将螺丝刀插在锁扣上用力撬，锁扣撬弯了，装弹舱开关的小门已经露出一条缝隙。伸进一个手指头用力一勾开关，炸弹舱门哗地一声打开了。

他们拿开轮挡，去掉空速管套，登上飞机。黄友寿熟悉地起动了机上的小发动机。黄文刚闪在后舱掏出手枪，准备哨兵一来干涉就干掉他。其他人迅速地各就各位，4个发动机一台接一台地发动起来了。这一切仅用三四分钟时间。

傻乎乎的哨兵背着步枪，站在机翼旁，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架莫名其妙的飞机。他们刹车，推动油门，迅速地滑进跑道，然后加满油门，随着发动机的怒吼声，飞机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跑道上疾驰。速度不够，黄友寿又把增压机加足，飞机咆哮着安然离地，直刺蓝天。这时，正好上空有一团低云，飞机上升到100多米，便钻进了云层，直向北平方向飞去。

后来，其他起义回来的同志告诉，当时在他们登机时，机场塔台上的值班员就发现了这个异常现象，赶紧打电话到饭堂找到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一听便扔下饭碗，搭上吉普车飞奔机场。但为时已晚，飞机飞走五六分钟了。

这天，由飞行员客串为机械师的黄友寿发挥了很大作用。飞机起义后，他发现前轮没有收好，爬到领航舱一看，原来是地勤人员已经在前轮舱口安上了木枪，并且上了锁，以防有人从这个狭小的缝隙中钻进去。当局采取的这一措施是大家事先所没料到的。黄友寿只好从机上工具箱中找出榔头，一锤一锤地把木板敲碎。收起前轮，飞机显得轻快多了。

黄文刚始终是枪上膛，人在位，警惕地监视着空中情况。

飞机沿着预定航线平稳地飞行，沿途天气很好，地图上事先圈出的地标一个个地从机翼下掠过。飞机越来越靠近北平，大家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大。然而，天气突然变坏。下午3点多钟快到北平南苑上空时，地面刮起阵阵大风，尘烟四起，沙土飞扬，水平能见度越来越差。他们只有飞越南苑机场上空才能看清跑道。第一圈和第二圈都是在高度很低时才发现没有对准跑道，只好复飞。飞第三圈时，地面的高射炮发出“警告”，炮弹在飞机周围开花。这是地面同志的误会。飞至第四圈时，终于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因为没有修好测风仪，在接地刹那间，巨大的侧风竟将沉重的飞机一边机翼掀起2尺来高，这是最后的一险。

下了飞机说明来意，立刻受到热情欢迎和款待。这天正好是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张雨农、黄文寿、任永荣、黄文刚他们感到随着古老的北平一起获得了新生。

## 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在爱国青年王颐桢等人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领导和舰长邓兆祥支持下，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并于次日驶向解放区烟台港口。

“重庆号”轻型巡洋舰，是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排水量5270吨，官兵574人。该舰系英国政府1948年5月交给国民党政府使用的，8月回国，10月到葫芦岛参加内战，11月回上海维修。

“重庆号”起义前，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始总崩溃。“重庆号”官兵绝大多数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在英国受训后于1948年8月接舰归国。舰上官兵因不满国民党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推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纷纷考虑另谋出路。

在这种形势下，舰上的进步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开始进行秘密串连，酝酿起义。当然，在这样一艘大型现代化军舰上举行群众性武装起义，组织工作必须做得十分严密。

最初的秘密串连，始于1949年1月前后。

开始，舰上的进步官兵、中共地下党员，在同乡、同学和好友中交谈思想，寻找同志，由一二人、二三人个别串连，到三五人不等的小组互相联络而结合，逐渐形成了两个秘密策划起义的组织：一个是王颐桢、毕重远（中共党员）等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共发展成员27人；一个是曾祥福、莫香传等组成的秘密组织，共发展成员16人。

在酝酿起义过程中，这两个组织的个别成员发生了联系。但相互间不敢轻信对方，两个组织仍分别按照各自的计划进行活动。

中共上海局得悉这些情况后，也通过各种渠道对该舰一些人员进行了争取工作。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这艘从英国归来的军舰颇有戒心，已采取各种组织上的“整饬”措施，但尚未全部贯彻。

1949年1月，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惨遭失败后，蒋介石为确保长江以南半壁河山，准备将“重庆号”调防长江，以配合江阴要塞防守长江下游，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这种情况，促使舰上的起义骨干决心加速行动。

2月25日凌晨1时30分，“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首先切断无线电和电话电源，同时将甲板上的哨兵及司令走廊上的值更士兵诱至雷达室缴枪拘禁。

起义行动按计划紧张秘密地进行。担任警戒的人员立即进入规定的岗位；行动组的人员拘禁了全部军官。

曾祥福等组成的另一起义组织和其他进步官兵也相继参加了各项起义活动。

舰长邓兆祥事先并不知道下属官兵在酝酿起义，但他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在“士兵解放委员会”宣布起义后，便毅然参加，亲自下令开航，指挥航行，率舰起义。

5时45分，“重庆号”从吴淞口起锚向解放区驶去。

26日晨7时许，“重庆号”驶抵解放区烟台港口，受到人民解放军、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重庆号”起义成功，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强烈反响，给濒临灭亡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11日下令，斥责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着即撤职留任，以示惩戒而察后效”。事实上，无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怎样“防范”，也阻止不了接连而来的起义行动。

“重庆号”官兵起义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3月24日致电祝贺和勉励。起义官兵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便被分配到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院校任职，成为人民海军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 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不久，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确定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今北京）办公。

3月21日，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和司令部作战科长尹健带领100辆大卡车、20辆中小吉普车，分别从平、津两地出发，到西柏坡迎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往北平。

在大家积极为进城做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这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起程去北平。

临行前，毛泽东只睡了几个小时。早饭后，毛泽东刚走出门口，周恩来就跟了上去交谈起来。

周恩来问毛泽东：“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风趣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是毛泽东在告诫全党全军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坚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

上午11时，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车队出发了。毛泽东一行共坐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排在第2辆，前面有前导车。车队出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

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由于土路路面坑洼不平，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着山间、平原公路，在飞舞的烟尘中颠簸向北前进，经灵寿、行唐、曲阳，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闫村住下。

这天晚上，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睡在用门板搭的床铺上。这一夜，毛泽东基本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门板搭的床上写材料。

第二天上午9时，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毛泽东等还听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下午3时继续北上，傍晚抵达涿县（现涿州市），住在第4野战军第42军军部大院里。

毛泽东在涿县看了市场，发现没有几家买卖，就问陪同的当地领导怎么回事？当地领导说，为了城内秩序，把商店暂时搬到了城东。毛泽东听后说，应当让他们赶快搬回来。

第42军领导万毅等去看望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毛泽东见了万毅就说，丰台之战你们打得好。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同专从北平带专列迎接的叶剑英、滕代远见面。首先听了叶剑英关于北平情况的汇报，然后研究了第二天（25日）的行程。

25日凌晨3时，毛泽东等乘坐的专列驶向北平。6时到达北平清华园火

车站。毛泽东下车后，与迎接在车站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见面，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

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各界代表 1 千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当夜，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 9 月 21 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迁往北平过程中，确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安全关系极大。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解放军北平驻军，对迁往过程中的保卫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反复研究方案。由于布置周密，才使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能一路平安顺利地到达北平，进驻香山。

25 日晚，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等已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 运筹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

1946年1月，李克农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兼总支书记，分工领导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等工作，并负责人事和安全保卫工作。这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上，李克农在党中央及叶剑英领导下，为孤立、揭露和粉碎美蒋反动阴谋作了大量艰巨而复杂的斗争，卓有成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上的人民解放战争。

当时，美蒋反动派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100余名破译人员，力图侦破我方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情报。李克农以很高的警惕性，对部属要求极严，不断对有关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使大家坚定一个信念：确保机密，分秒必争；提高警惕，应付突变；一旦被捕，就献身革命。那时，机要室和电台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李克农要求同志们一切生活事宜自理，不许饭店“服务人员”进入楼内。但是，这些所谓的饭店“服务人员”总是制造种种借口，如检修门窗、检修电话、清点家具、换洗床单等等闯入楼内。对此种种，我方都妥善应付。

敌特在南楼无计可施，便在餐厅、走廊里施以女色挑逗，我方人员均决不上当，使他们“自作多情”，灰溜溜收场。一度，在我电台联络时，经常出现可疑电波，经缜密地侦查确知，这架电台就设在翠明庄楼内地下室里，是专门偷抄我方密电的。我方以确凿的证据向美蒋反动派提出严重抗议，可疑电波便销声匿迹了。随着国共谈判斗争的激烈和复杂化，敌人又在饮食上作文章，把伙食办得越来越糟。一天，李克农来到餐厅，把翠明庄负责人叫来，当众愤怒地质问和训斥他，抗议他们严重违反停战协定、违反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克扣军饷！弄得敌人狼狈不堪，连忙陪礼道歉，从此再不敢在伙食上卡我方人员了。

1947年，李克农回到延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李克农到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任委员，分管情报工作。后委书记是叶剑英。为保证战争胜利，李克农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北平一和平解放，李克农即被中央派来北平，会同叶剑英、彭真等为中央领导和机关作入城安排。北平解放前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麇集了一帮反动势力和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对革命新秩序的建立危害很大。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他会同北平市党政负责人一起，领导有关部门大抓治安工作，稳定社会秩序，仅半年内，就破获特务匪徒阴谋暴动案83起，逮捕首要特务分子560多人，敦促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的1900余人，清查和处理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假钞票、盗窃、抢劫案等共1.4万起，还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

1949年3月25日，迎着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黎明曙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叶剑英陪同下，乘火车由河北平山来北平，到了清华园车站，这是李克农参与精心安排的。他还陪同聂荣臻、彭真到站迎接，并派以前给自己开过车的司机给毛主席开车，把毛主席一行接到颐和园益寿堂歇息。饭后，李克农他们又和周副主席研究了阅兵仪式的安全问题。之后赶到西苑机场作阅兵式布置检查。再赶回颐和园，陪中央领导同志午饭后，乘车前往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北平市群众代表、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最后，将中央首长送到香山下榻。这期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



同志的一些重要外部活动，李克农都要亲自布置，有时还要亲自迎送保护安全，做到慎之又慎。

这个时期，李克农在情报工作活动上也是繁忙的。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其中有位顾问金山，是老共产党。谈判期间，金山悄悄离开住所，到党指定的联络地点向李克农汇报国民党代表团的全部机密，使中共代表团对国民党每天的动向了如指掌，从而处处都操纵着谈判桌上的主动权。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上，也得到了李克农所领导的情报工作的有力配合。

## 女扮男装讨血债

淮海战役一结束，宋清辉所在的部队经苏北连水一带休整补充后，便进至皋县地域，为准备强渡长江天险展开了大练兵。

这是 1949 年 3 月的一天。宋清辉刚刻完半张蜡纸的表彰团卫生队蒙眼抬“伤员”过独木桥的快讯，正准备赶紧油印时，宣传股小耿同志急呼呼地跑来说：管理股炊事班出了新闻，你赶快去采访吧。

宋清辉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忙跑去，一了解，果然发生了震动全团的大新闻：原来，在淮海战役后，管理股炊事班补充了 3 名解放战士，他们表现都不错，特别是其中一名叫严风的，虽然长得单薄，但却很能吃苦，样样活儿抢着干，练兵习武也争先，今天早饭后，炊事班又去练习闭眼挑担过 10 米长的独木桥，严风一失足掉入河中。水深流急，危在旦夕。岸上的同志立即跳下河，把他救了上来，这时他已昏迷了过去。卫生队全力抢救，在脱下他湿淋淋的衣服时，发现原来是个假小子！

她苏醒后，面对着大家的惊奇目光，倾吐出一部血泪史。

她原名严玉凤，河南省汝南县人，幼年丧母，父亲给地主当长工累坏了腰被赶了出来，哥哥两年前被国民党抓兵杳无音讯。17 岁那年 6 月，国民党军一部窜至汝南县城。父亲思儿心切，壮着胆子前去寻儿，一去未还。玉凤前去寻父，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送到“军中乐园”（随军妓院）受尽非人的糟践。

有一天，一个国民党兵闯进来一看到玉凤，便认出是自己的亲妹妹！兄妹相逢，抱头大哭，痛不欲生。哥哥掏出手榴弹想与妹同尽，被妹妹止住了。玉凤说：“哥哥，咱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呀，还得活着报仇啊！”于是，就在这天夜里，兄妹俩密谋逃走，可谁知因心慌意乱竟迷失了方向，第二天中午又被一伙国民党军队抓去，哥哥被当作逃兵枪毙，玉凤又重陷火坑。

直到 1949 年 1 月 6 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我军发起总攻的那天黄昏，趁敌军溃散混乱之机，严玉凤才又一次女扮男装，逃出虎口，于次日拂晓混入我军押解的战俘群中。从此，她下定决心不露身份，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军，誓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

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 爱民炮

1949年3月间，带着淮海战场上的满身硝烟，我华东野战军特纵某炮兵团，奉命驻扎在长江下游的青龙一带，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阵地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此起彼伏，激励着全团官兵刻苦地进行着战前练兵。战士们有的在练操炮，有的练瞄准，有的练装填弹药，还有的在精心地擦拭保养着心爱的大炮。江边上，一门门乌光闪亮的大炮，像威严的雄狮，整齐地蹲在那里，翘首注视着江南，巨大的炮口时刻准备着吞噬江南的一切敌人。

隔江相望，江南岸一片凄凉沧茫。民房被拆完了，树木被砍光了，遍地是林立的碉堡，纵横的战壕，张牙舞爪的铁丝网更是一道道地横卧在这片饱受战争创伤的绿色土地上。疯狂的敌人用皮鞭、刺刀和枪托逼迫着乡亲们修筑工事，从60多岁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孩子，全被赶到了江堤上没白没夜地做苦力，稍有不慎，轻则惨遭毒打，重则被枪毙，抛尸江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南岸不时传来乡亲们悲惨的哭叫声和敌人疯狗一样的喝骂叱责声以及枪杀乡亲们的罪恶枪声。

看到南岸的乡亲们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受煎熬，战士们心里难过极了，对敌人的仇恨也增加到了极点，真恨不得立即开炮，消灭可恶的敌人，救出苦难的乡亲们。可是，敌人和乡亲们混在一起，打炮怕伤着乡亲们，不打炮，又怎么救乡亲们呢？急得大家吃不好，睡不着。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到底是人多智慧大，办法终于被大家想出来了。一天，观察员和战士们兴冲冲地拥到了炮1连的连部，向连长建议说：“我们用延期信管发射，专向敌人的大地堡上射击，这样，敌人听见炮响，准会向地堡内躲避，乡亲们就可以逃跑了，而我们正好又消灭了敌人。1连长一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立即向营、团首长做了汇报。团长非常重视，亲自来到了1连的炮阵地。他对自己的炮兵是相信的，但是他又担心，要是有一点偏差，那就会伤着乡亲们呀！他冲着炮手们大声问道：“你们有把握打准吗？”战士们齐声回答：“保证打得准！”，团长思索了一会，终于下定了决心，“好！炮手准备，先打3发。”团长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轰！轰！轰！”3发特殊的炮弹，带着战士们对乡亲们的爱，对敌人的恨，呼啸着掠过江面，在敌人的地堡上延期爆炸了，火光硝烟中，敌人的1号、3号、5号大地堡飞上了天空，躲进地堡里的敌人也找到了理想的坟墓。而乡亲们则趁机跑得无影无踪。我炮兵阵地上腾起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大家亲切地把打这种炮叫作“爱民炮”。

从此，“爱民炮”传遍了沿江的炮兵部队，大家都用这种办法消灭敌人，解救乡亲们。敌人一听到“爱民炮”声，则像躲棺材一样地远离地堡，到处逃命；而乡亲们一听到炮声，则放心大胆地跑个一干二净。

4月份，部队打过了长江，听到江南的乡亲们到处传说着“爱民炮”的故事，人人都说：“解放军的炮弹有神灵相助，长着眼睛，专找蒋匪军打，从来不打老百姓。”

## 巧运金圆券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为了加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彻底垮台，党中央在积极准备军事打击的同时，决定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尽快将在解放华北、中南和西北地区缴获的一批巨额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秘密运往江南国民党统治区，交给地下党组织处理。根据中央指示，这项秘密行动，由当时担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的叶剑英负责。

国民党南京政府此时已风雨飘摇，但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极其害怕解放军把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大批金圆券运到江南，使本已千疮百孔的经济加速崩溃，政局更加动荡，民心更加不安。他们深知，如果这批金圆券流入市面，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一方面加紧军事上的垂死挣扎，一方面下令国民党江防部队对长江严加警戒，“不许通过一船一人”，把可能过江运送的途径封死；同时，派出大批特务到香港活动，把可能通过运送的中转通道堵死。

面对敌人的封锁，叶剑英和负责这项行动计划的联络部副部长王磊商量后，认为走水路过江困难比较大，决定在运送国民党谈判代表来往于北平、南京的中航公司的专机上想办法。而要实现利用这架飞机的大胆设想，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人才行。于是，叶剑英打起了谈判代表团随员的主意。

随谈判代表团来北平的有两名随员，一个是叶剑英同窗挚友于仲仁。此人有较强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可以设法争取。另一个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郭子玉，非常狡猾，且负有监视谈判代表行踪的特殊使命，这个危险分子必须设法摆脱。决心定下，叶剑英马上秘密会见于仲仁。

一天，于仲仁摆脱特务监视，悄悄来到与叶剑英约好的会面地点。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寒暄之后，叶剑英便单刀直入，把谈话引入正题，说：

“老同学，今天搬你的大驾，有一件要紧事请你帮忙呢！”

于仲仁忙问：“什么事？”

“掉脑袋的事！”叶剑英用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老同学，严肃地说。

于仲仁从叶剑英那一脸凝重的神色中，感到事关重大，但从这位共产党高官的眼神里，又感到老同学那信任的目光，很是兴奋，马上表态：“只要我于仲仁还能做点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事，掉脑壳也算不了什么！”

“好，就等你这句话！”说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叶剑英高兴地拉起于仲仁来到里屋，与等候在那里的王磊相见。然后，三人一起研究商定了进行这次特殊行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中航公司的机组人员突然接到命令：马上起飞！送谈判代表邵力子先生回上海。

于仲仁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叶剑英。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马上着手准备。可是，如何才能摆脱郭子玉这个特务呢？正在于仲仁冥思苦想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说郭子玉因肚子疼被批准留在北平，由于仲仁单独护送邵力子先生回上海。“这下可好了！”于仲仁暗自高兴。

原来，郭子玉这次来北平，除了负有特殊使命的“公事”外，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那就是想从北平搞一些已在这里变成了废纸的金圆券，带回江南发一笔横财，以备日后他用。可是，想归想，说归说，眼下一张金

圆券都没有弄到手。听说马上要飞回上海，懊恼之情袭上心头，觉得这样空手回去太可惜。于是装病请求留下来。

上飞机前，为了彻底摆脱郭子玉这个麻烦，于仲仁特意把谈判代表团的陈医生找来为其“看病”，借机稳住他。经检查，诊断为患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打吊针进行观察。郭子玉暗自叫苦，但又怕暴露自己的阴谋，只好硬着头皮躺下输液。躺下没多久，郭子玉心里开始犯嘀咕：装机时怎么那么多行李物品，特别是那些又沉又重的大皮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越想越怀疑这里可能有名堂。

于是，他欠起身对陈医生说想到外面去看看。不管怎么说，陈医生就是不给他拔下针头。此时，飞机巨大的轰鸣声传到郭子玉的耳朵里。他有些急了，猛地推开陈医生，拔下腕上的针头，冲出门去。

已经晚了。这时的飞机已上了跑道，随之腾空而起，向南飞去。

郭子玉不甘心，马上跑去找到一个在北平潜伏的特务，要他给上海发电，让上海方面做好拦截检查专机物品的准备。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郭子玉万万没有想到，叶剑英比他棋高一着。装有数百亿金圆券的专机，并没有直飞上海，而是在南京安全卸货后，才飞到上海。早已等在上海机场的国民党特务，拦截检查的却是一架空飞机。

## 智送城防图

在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太原围歼战开始了。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第2、第3兵团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敌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敌顽抗，则待华北2、3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3月底，由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整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第19、第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会师于太原前线。

我军要攻城，首要的准备工作是弄清敌人的城防设施。这样才能攻敌要害，避己伤亡，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这方面，虽然各部队都派出侦察人员，但太行军区情报处小常情报站，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早在1948年秋，潜伏在太原市进山中学的共产党乔亚，便接受了绘制城防图的任务。他根据上级发来的指示，团结进步青年，利用外出给敌人修工事的机会，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绘制成一套城防简图，派一个同学送到城外。乔亚于1949年8月领导过学生运动，曾被阎锡山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拘捕过，后获释，但一直被敌特暗中监视着。他绘制城防图的活动早已被暗探觉察，因而他派出的那个学生中途便被敌特逮捕。学生叛变了，乔亚牺牲了，城防图仍未得到。这样，小常情报站就把任务交给了另一地下党员张全禧同志。

张全禧是日寇投降后不久，便被派进太原城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在太原城内府西街开设了谦益信自行车行。太原市的特务控制极为严密，做地下工作相当困难；但张全禧有着长期的工作基础，又有巧妙而细致的工作方法，终于完成了绘制城防图这一艰巨任务。

阎锡山的长官部有一个黄参谋，从小家境贫寒，民国初年，在太原工艺实习厂学徒，而后投军到阎锡山部下，当过班、排、连、营、团长和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因执行命令不坚决，被阎锡山撤过几次职，如今只落了个侍从参谋的虚衔。

这个从小贫苦中途发迹的旧军官，有一定的正义感。日寇投降后，他曾幻想：从此国家可以独立富强，个人生活更有保障。但他返回太原后，只见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佩刀骑马，招摇过市，日本兵烧毁物资，蛮横依旧；汉奸省长苏体仁，公开出入阎公馆的大门，伪军头目杨诚、赵瑞，竟当上了省防军的军长；反动首领梁化之、王靖国、赵承绶、杨贞吉等人，各立商号，大发横财；阎锡山为培植亲信，到处加官赐爵，滥委官衔；流氓打手，依附权贵，无恶不作……他的幻想破灭了。加之本人遭受排斥打击，经济上也很拮据，于是便消极抑郁，自甘堕落。他曾经为自己考虑过两条出路：一是利用职权，改业从商，借以维持生活；二是到外地投靠旧长官，另谋生路。

一天，黄参谋到谦益信自行车行修车子，张全禧接待热情，初次见面，他就觉得张经理为人慷慨，和蔼可亲。不久，又来修车，张全禧不仅精心修理，而且还把车子送到外面重新喷了漆，付款时张全禧说什么也不要，使他倍受感动。不仅如此，就是生活用品，只要他需要的，张全禧甚至设法从北平为他购买；至于逢年过节，更是赠礼送金，使他全家大小对此感激不尽。

就这样，二人交往了两年多，已成为彼此不分的挚友。

随着阎锡山的统治日益接近崩溃，其统治愈加黑暗，愈加腐败，黄参谋对阎的不满情绪也随之越来越大。他早想向他的旧长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写信泄愤，只因特务信检很严，不敢邮寄。晋中战役后，他的一个下级军官双目失明，要乘飞机经天津到南方某地疗养，他决定趁机带信给陈长捷。信中说：山西领域日渐缩小，全省军政单位全部撤退太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粮秣军饷，完全断绝，每天靠几架飞机空投接济，杯水车薪，难以长久。此间环境十分混乱，每天都闹饭荒，大部士兵患夜盲症，抢劫投机之风笼罩全城。古人说失民者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总之，这里很不乐观，我想离开此地，到钧座属下效力，请设法予以安置。

恰巧，这天张全禧又到黄参谋家闲聊，看到了此信。黄参谋大惊失色。他想：这事一旦传出去，不被阎锡山处死也得下狱坐牢。

张全禧抓住时机做黄的工作。他首先对他的境遇表示同情，然后对他说：

“忍耐是有好处的，不要着急。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怎知天津会比太原好些？慢慢看清情况再说，到非走不可的时候，自然有路可走。”

黄参谋对这一劝慰表示感激，但并未理解其中的含意，还是把给陈长捷的信捎走了。

在这之前，张全禧怕黄参谋翻脸不认人，只在经济上进行拉拢，加深相互之间的友谊，不敢轻易谈论政治。现在，同他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了。

有一次，张全禧试探地说：

“城市不如乡村好，尤其是山里边，环境更僻静。你去过山里吗？”

黄参谋骤然一惊：

“你指的是哪个山里？”

张全禧坦然地回答：

“就像辽县、昔阳一带。”

黄参谋笑了笑说：“没去过。那里都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停了一会，又感慨地说：“这年头，城里真不如山里好。”

张全禧觉得有了点底，描绘一番山乡的景色就告辞了。

又一天晚上，张全禧找黄参谋闲聊。这次他开口便说：

“我到过太行山，认识八路军。咱们要能跟八路军取上联系，将来一旦城里待不下去，还有一条出路。”

黄参谋这才明白了，于是便询问张全禧的历史。因黄参谋毕竟是一位旧军官，加之地下工作的纪律，张全禧不能合盘托出，只是说：

“我的家在太谷小常村，我掩护过他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跟他们有点联系。”

黄参谋仍犹疑不定。因为他对我党的政策还不怎么了解，总是想找他的旧长官找出路。

1948年11月天津解放了，陈长捷被俘。由于失去了靠山，这对黄参谋是个不小的打击。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考虑通过张全禧为八路军做点事，兴许是条活路。于是便明确表示：

“张经理，我想去投靠八路军，你看敢不敢？”

“怕什么？我们村里就有八路军。守城外前沿阵地的又是你的老部下，进出都方便嘛！”张全禧说罢观察了一下黄参谋的脸色，见没有什么反感，

又说：“要走，总得先做一点事才好！”

黄参谋叹了一口气，说：

“唉！原先我是师的参谋长，就是活捉阎锡山也能办得到；现在兵权失手，能做什么事呢？”

张全禧趁机向他提出：

“解放军很快就攻城了，你可以利用你的参谋身份，到前沿阵地观察，了解城防设施，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嘛！”

事情终于谈成了。黄参谋给张全禧弄了一套军装穿上，同他一起，乘军用吉普车，首先到前沿阵地“观察”；接着以核实校正作战地图的名义，向各守备部队索取资料。哪里是明堡，哪里是暗堡，哪里是步兵，哪里是炮兵，哪里有堑壕，哪里有电网……都一一标在图上。

城防图绘制成功了，如何送出去还是个难题。为此张全禧整夜不能成眠。结果在修车工人张宪明的协助下，终于想出了办法：把自行车大梁和内胎割开，将十几张图紧塞进去，再照原样焊接、修补起来，完全不露痕迹。

1949年初春的早晨，浓雾覆盖着大地，炮声时有所闻。张全禧推着格外笨重的自行车，在黄参谋的护送下，直奔城南杨家堡。负责守备杨家堡前沿阵地的阎军某师第3团团团长正是黄参谋的老部下，他听说旧长官的“卫士”要到太谷安顿家眷，便笑脸放行了……



## 徐向前的“乡情”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阎锡山盘踞 28 年的老窝。1949 年 4 月 24 日，太原解放了。城里城外，人们喜气洋洋，传说着：

“‘土皇帝’坐飞机跑了，十几万人马，全完蛋啦！”

“徐向前进城了！”

“他和阎锡山是老乡呀！都是五台人！”

“哪，五台人又沾光罗！”

“……”

阎锡山名声本来很臭。多少年来，他征粮、要捐，拉夫拉兵，他的军队又欺压百姓。山西老百姓恨死了他，不叫他的姓名，都叫他是“土皇帝”。可是，在五台县河边村一带，他的名声却不臭。原来这个大军阀，像兔子一样，“不吃窝边草”。在村上办了小学，又办起中学，没钱念书的人，他免费。五台县人在太原当官的多，又传出这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其实，真沾阎锡山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那些地主、大商人。太原解放了，人们心想，阎锡山当大官，五台人沾光；徐向前来了，他也是大官，五台人准又沾光。

于是，不少的五台人，还有徐向前的亲友，纷纷奔到太原，要找徐向前司令员。

徐司令员还没进太原城就病着。他病得很重，不能吃饭，不能走路，每天坐着担架指挥作战。幸得总攻太原前，彭德怀司令员路过太原前线，代他指挥了攻城。城打开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事，又得徐向前出面。要彻底清查敌人的散兵，收缴武器；还要组织工厂开工，尽快安排太原城十万人民的生活。一些亲友来找徐向前，他没功夫会见。

太原城里，很快传出话来：

“徐向前这山西人，不认老乡！”

“五台人他也不见呢！”

“……”

徐司令员这时想要见的，却是两个人：一个叫梁化之，一个叫戴炳南。这是两个罪大恶极的战犯。他们是阎锡山的帮凶。解放军总攻太原之前，阎锡山坐飞机逃往了南京，梁化之、戴炳南代行一切，屠杀人民，誓死与解放军为敌。太原解放了，十几万敌人消灭了，就是不见梁化之与戴炳南的下落。徐司令员命令部队：一定要把梁化之、戴炳南查到，捉不到活的，也要从死人堆里把他们找出来！

一天早起，两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人，找到军管会办公室来，口口声声要见徐司令。还说他们是徐司令的老乡，找徐司令要做买卖“借”汽车拉货。徐向前一听报告，火了，抓过电话，大声说：

“告诉他们，汽车是人民的，不是我徐向前的。一辆车，一滴汽油都不准动！”

从此，又传出话儿：“徐向前不认亲，不认友，不念旧交！”

一天，徐向前的两个姐姐来看他。久别重逢，感慨万千，两个姐姐有说不完的“苦水”……。

从姐姐言语中，徐向前听得出，她们这些年过得挺惨。他想到父母、姐姐和乡亲们，受了自己多年的连累，吃了许多苦啊！又想到抗战开始回家那

年，两个姐姐把儿子交给他参加了八路军。不幸的是，大姐的儿子郭福安，二姐的儿子赵希圣，在战争中都牺牲了。在姐姐心目中，弟弟这如今做了“大官”，一定会念旧情，看在外甥的情份，厚厚地赠送一些财物。刚刚解放的太原城，没收敌人的金银财物，真是堆积如山啊！然而，徐向前没有给姐姐们什么，他给姐姐的，只是好言劝慰，赞扬她们为革命献出了儿子。他向姐姐说：

“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共产党干部再大，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开饭了，饭桌上是普普通通的饭菜。徐向前和姐姐吃一样的饭。他还病着，春天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旧军服。他的爱人黄杰，像他一样，也是一身旧军装，普普通通的穷兵。

姐姐们不理解，弟弟做了“大官”，整个山西他都能管，全太原城他说了算，却为什么这样清贫？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啊！……

徐向前抱着多病的身体，每天还尽力工作。他唯一要报答乡亲的，是建设人民的新太原，彻底清除太原城里敌人残存的散兵、特务。

几天后，报告送来了：战犯梁化之和阎锡山的“五妹子”，烧死在一个地下室里，尸体上还残留着一颗图章；戴炳南藏在阴阳巷二号一个厨柜里，被搜查出来。……

山西全境解放。太原城里，人民尽情地欢唱着：

从前当牛马，  
如今做主人，  
昨日泪满巾，  
今天庆翻身……

徐向前真想漫步街头巷尾，看看太原这个古城。看看他在国民师范读书的旧址，看看他去考黄埔前住过的一家，看看抗日战争开始，他跟周恩来同志一块和阎锡山谈判的会址。可是，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病一天比一天重。在一年半之内，他在山西连续指挥了四大战役，歼灭了敌人三十万，山西全境解放了，他却累垮了！……

徐向前心系五台、山西和全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五台人心里念着：他是人民的儿子，五台山的骄子！

## 渡江战役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和第4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的其他战役，人民解放军在消灭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后，百万大军逼近长江。蒋介石在国民党已失去战略上有效防御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部署扩军备战，将其115个师70万人部署在湖北省宜昌至上海间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其中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沿江地区及纵深浙赣线一带；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沿江地段。另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的江面上，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戈；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决定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组织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江作战。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共中央军委于2、3月先后决定，以第2、第3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及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作战；以第4野战军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归第2野战军指挥，位于武汉正面箝制敌白崇禧集团，策应第2、第3野战军渡江。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共第2、第3野战军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3月31日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2野战军3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3野战军4个兵团分别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500余公里战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突破敌之长江防线。渡过长江后，第3野战军主力切断宁沪铁路和宁杭公路，围歼南京、镇江、无锡地区之敌；第2野战军除一部直趋芜湖、南京，协同第3野战军歼灭宁、沪、杭地区之敌外，主力直出浙赣线待机，准备协同第3野战军粉碎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上述计划。18日又指出，此次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2野、3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2野、3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的任务。

担任渡江作战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全面紧张地展开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先后拔除枞阳、仪

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 10 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全力渡江开辟了道路。战役分 3 个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南京。为争取国共双方代表团于 4 月 1 日开始的谈判能够达成实现国内和平的协定，人民解放军第 2、第 3 野战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之后，曾数度推迟渡江时间。4 月 15 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 4 月 20 日签字。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夜，人民解放军第 2、第 3 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长江南北广大人民支援下，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发起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芜湖以西裕溪口至枞阳段 100 余公里的正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一些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进攻，至 21 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21 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展开于龙稍港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等地突破敌军防御后，击退其多次反击，于 22 日进抵南闸、百丈一线，建立了东西 50 余公里、南北 10 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争取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 7000 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西突击集团在枞阳镇至望江地段突破敌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 100 余公里、纵深 5 至 10 公里的滩头阵地，于 22 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 88 军大部。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英帝国主义 4 艘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予以猛烈还击，将其中的紫石英号军舰击伤于镇江附近江面。后 4 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为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鉴于江防已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于 22 日下午仓促部署全线退却。人民解放军东、中、西突击集团继续向敌纵深猛烈发展进攻。至 23 日晚，东突击集团相继解放无锡、常州、丹阳等城，切断宁沪铁路，并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 2 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 25 艘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迫使另一部舰队 23 艘在镇江江面投降。当晚，第 34 军进占镇江，第 35 军进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22 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与此同时，中突击集团占领芜湖，并渡过青弋河；西突击集团占领青阳、贵池等地。至此，东、中、西突击集团已展开于长江以南，达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为下一步向敌纵深发展，合围歼灭国民党军残部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态势。

在第 2、第 3 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解放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 2 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战役第二阶段，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占领浙赣线。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根据沿江之敌向沪杭及浙赣线总撤退的情况，总前委及时调整部署，以第 3 野战军主力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两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迅速前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求歼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第 2 野战军前出浙赣

线，全力迂回敌之侧背，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3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各部队接到命令，日夜兼程，冒雨疾进，紧追逃敌。至4月27日，第3野战军第10兵团之第29军占领苏州，其主力与第9兵团会师吴兴，将南逃之敌第28、第45、第4、第66、第51军等部包围于郎溪、广德山区，经两日激战，敌军全部被歼于界牌、独山镇地区。在此期间，第7兵团于5月3日进占杭州，随即渡过钱塘江继续追击敌人；第2野战军在皖南游击队策应下，于5月1日至7日，经屯溪、婺源、乐平直趋浙赣线，先后解放上饶、贵溪、衢县、金华等地。同时，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至此，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顺利达成。

战役第三阶段，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解放武汉、南昌等地。郎溪、广德围歼战后，退守上海市及其周围地区的汤恩伯集团8个军25个师共20万人，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企图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4000多个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准备大肆破坏该市，阴谋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白崇禧集团，企图以一部兵力迟滞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渡江，掩护其主力向湘赣边和湘中、湘鄂西地区退却，在汨罗江以北、长沙以东和大巴山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湘、赣、粤、桂和西进四川。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发展，决定以第3野战军第7兵团向浙南、浙东进军，解放浙江全省；以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以及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残部的任务；以第9、第10兵团攻取上海；以第2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休整，策应第3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出击，待机进占南昌；以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九江间待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为第4野战军主力尔后进军中南创造条件。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郊区地形平坦，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地下水位高，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以第21、第51、第52、第54、第75、第123军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一部，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之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以第12、第37军共5个师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海防第1舰队和空军协助陆军防守。中央军委为达成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今后建设之目的，向总前委、华东局和第3野战军首长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局和第3野战军前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各系统的接管机构，拟制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央关于接管方针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秘密地组织大批纠察队，准备护厂护校。参加攻城作战的各部队也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并规定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重武器，尽量减少对城市建筑物的破坏。

根据上海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第3野战军决定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分别经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攻击，直逼吴淞口，先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围歼市区，分割歼敌。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各参战部队迅即向上海外围之敌发起攻击。第9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川沙、白龙港等地，威逼上海守敌侧背；第10兵团攻占昆山、太仓、浏河、月浦等地，并肃清了刘行残敌。至22日，将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

为攻取市区，歼灭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23日夜，第9、第10兵团同时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激战至27日，歼灭守敌大部，残部经海上逃跑，上海宣告解放。

在此期间，第3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策应下，先后占领温州、宁波及浙江东南部广大地区。第2野战军解放闽北南平、古田和赣中广大地区，另一部于22日进占南昌。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白崇禧集团全线南撤，并于15日争取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随后于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第3野战军一部于6月2日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歼灭其重兵集团11个军部、46个整师共43万余人，解放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 炮击英国军舰

在我解放大军胜利渡江之时，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妄图掩护国民党军，出来找岔了。

4月20日晨，正在泰兴县上圩港附近的我特纵炮6团，已架设好了大炮，准备掩护东路大军渡江。光荣的任务，激动着每一个人。

早饭后，炮7连正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连部指挥所电话铃响了。连长蔡廷捷握着耳机子，两只大眼闪闪发光，从他那瘦瘦的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大家猜想一定是任务来了。果然，连长一放下耳机就喊：

“同志们，今天下午咱们东路大军渡江。现在南京方向有十几艘军舰，企图从咱们面前逃路，渡江指挥部命令我们截住它。立刻准备战斗！”

一声命令传出，隐蔽在江岸上的大炮，唰地撤去炮衣，一个个黑黑的炮管，从伪装网下昂起头，指向长江。接着，观察班报告：

“上游发现两个黑点移动，像是兵舰。”

“监视它的行动！”连长向观察班命令后，紧接着要通营指挥所的电话，对营首长作了报告。

几十分钟后，观察班的报告又传来：两艘外国军舰，正全速驶来。

一听说是外国军舰，大家顿时情绪来了，三炮手郝金亮说：“好啊，准是美国鬼子出马了。来吧，我们早就准备接待你了。摆在这儿的榴弹炮，全部是美国造，每发炮弹上，都还保留着U.S.A的标记，今天让美国鬼子自食其果，尝尝他们自己的炮弹啥味道吧！”

“军舰上一色的‘米’字旗，是两艘英国军舰。炮口全指向我们……”观察员作出了准确的报告。

连长愤愤地说：

“好！等美国鬼子不到，英国佬倒出马了。”他立刻下达命令：“各就各位！”

大家听说英国军舰开进了长江，又听说炮口全对着我军，一个个气得两眼冒火。阵地上一片吼声。这时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我军的警告信号表明着：长江，已经不再是蒋家王朝可以任外国兵舰随意出入的长江了；中国，已不再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但是，这批英国佬手里还捧着一本老黄历，总以为中国人是怕“洋人”，怕“洋炮”，怕“洋舰”的。自从我军开始渡江战役以来，英国的皇家军舰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和伦敦号，就明目张胆地开进长江，和国民党的军舰勾结一起，干涉我军渡江。现在又一次来挑衅的，正是紫石英号和黑天鹅号。

两艘侵略舰不但不顾我军的警告，而且张牙舞爪，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一直驶进我军防区，接着咚咚一阵排炮，打在我7连的阵地上和右边修船工人驻区，几间民房立时燃烧起来。7连好多同志负了伤，郝金亮身上也中了一块弹片。这时只见连长把帽子一扔，喊了一声：“让你瞧瞧人民解放军的厉害！”接着下达了命令：

“目标——帝国主义的军舰，开炮！”

郝金亮包扎上伤口，又走向自己的战斗岗位。霎时，一阵炮弹腾空而起，飞向侵略者。

就在我7连开炮的同时，我特纵炮3团的炮兵也投入了炮战。

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平静的长江，水柱突起，烟卷波涛，激起千堆雪，大江之中一片轰鸣。

两艘侵略舰陷入火网之后，仍拚命地顽抗挣扎，集中它们所有的炮向我军阵地猛轰，企图占个上风。可是占优势的并不是侵略者，我军无比强大的炮兵群，不给它喘息的机会，炮弹遮天盖地地压向侵略者的头顶。炮烟中，军舰上的“米”字旗被打得纷纷撕裂，卷进长江。有一艘军舰冒起了浓浓的黑烟，燃起了大火。

这批英国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在曾经横行无阻的长江里，竟然会大吃一顿美国制造的炮弹。

下午1时半，另一艘英国军舰从上游顺流疾驶三江营，增援受创的英舰，同我军展开了激烈炮战。来援的英舰中弹5发后全速下驶以脱离我军火网，然后折回沿北岸上溯又向我军炮击。我炮3团7连炮位因掩体限制了射界，火力不能开展，被英舰击毁火炮2门。该舰继续上驶时遭到我炮3团1连炮火重创，乃掉头驶向下游。

夕阳西下时分，一架飞机从西飞来，逐渐听到它微弱的嗡鸣。它慢慢地降低高度，并徐徐滑向英舰。

这架巨型水上飞机竟敢飞来援助在我国内河闯出战祸的外国军舰。炮3团7连立即把最后一门长管野炮拉出掩体，并奉命向这架水上飞机发出警告，向7公里以外的江面发射炮弹，炮弹正好落在滑行的飞机与英国军舰之间。炮弹溅起的水柱和浪花迫使飞机不敢继续前进，立即掉头向南京方向飞去。

这时，武进（常州）广播电台已广播被“共军”击毁的英舰上的官兵60余人弃船逃到武进，并已转乘火车赴沪。外电也报道了在长江肇事的英舰为“紫石英”号。

“紫石英”号紧靠南岸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又已降下了白旗，该舰的位置正阻挡我步兵强渡的航线，因此步兵要求炮兵强迫该舰驶离现停泊点。7连向“紫石英”号发射后，舰上冒起了爆炸的烈烟。这时江水也受到潮水的影响而上涨，“紫石英”号被俘起移动了，渐渐消失在薄雾飘浮的水天之际。

后来，英国的一家刊物曾透露了英舰受创的情况：我军有一发炮弹从吃水线下射入了“紫石英”号的弹药舱，但是没有爆炸。这枚未炸的炮弹后来被陈列在英国的一家博物馆。外国的报道对解放军炮兵与英舰在短促的交火中能有很高的命中率表示惊讶。由于我军的武器弹药都取之于敌，弹种不全，破甲弹和延期信管尤缺，虽然命中弹使舰上的装备受到很大的破坏，人员受到不小的伤亡，却未能击沉目标。

英国的远东舰队获知“紫石英”号在长江内受创的消息后，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立即乘坐旗舰——巡洋舰“伦敦”号并率领驱逐舰“黑天鹅”号及“伴侣”号驰援。4月21日晨，英国舰队驶过了江阴继续西犯，闯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

在中国内战正酣，国共两军隔江对垒，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小时后就要发动渡江作战的时刻，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竟想强行通过解放军阵地去增援1天前同解放军发生炮战的“紫石英”舰，它们眼里哪里还有国际公法？哪还有中国的主权？哪还有中国人民的尊严？江上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而严峻了。



百余年来中国曾饱受英国炮舰政策的侵略和凌辱，沿海的广州、定海、天津和长江上的万县、南京、上海等地都曾惨遭英国舰只的袭击和蹂躏。由于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外国的压力下卑躬屈膝、媚外求荣而不惜丧权辱国，使中国人民长期蒙受着羞辱。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直捣南京，旧中国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已临最后的溃灭。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人民解放军岂能容许外国舰队在我国的内河横冲直闯？怎能在渡江作战即将发起的时刻，忍受外国舰队的威胁和干扰？

早在北岸待命掩护步兵渡江的特纵炮1团向英国舰队发出了警告。英舰自恃甲坚炮重，置我警告于不顾，在人民解放军阵地的前沿强行西驶，显示武力。

我沿岸炮兵忍无可忍齐向英舰队开火，霎时间，英舰相继中弹，舰上冒起阵阵浓烟。“伦敦”号目标最大，中弹尤多，一发美制105榴弹击中它的司令塔，弹片撕裂了梅登中校的制服，舰长负伤。陷入解放军火网的英国舰队发现解放军抗击的决心和威力远远超过它们的预料，自知无法强行通过，才掉头东向，几艘英舰带着遍体的弹孔和创痕驶往上海。

美国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几艘军舰，得知英舰受重创的消息，在解放军发起进攻之前就驶向了太平洋。

“紫石英”号事件沉重地打击了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在华实施的炮舰殖民政策，使得作为海军大国长期在中国横行无忌的英国远东舰队丢尽了脸面。英国海军部提供的资料表明：英军在冲突中共计死亡水兵42人，受伤52人，4艘军舰上有5名正副舰长伤亡。

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发言中声称：“英国军舰有权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的使命……。”同一天，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我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并叫嚣“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报复”。

针对艾德礼和丘吉尔的讲话，4月3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声明予以驳斥。声明质问丘吉尔要报复什么？“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声明指出，“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紫石英”号事件，从军事角度上来看，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其政治影响却非常深远。它表明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已不怕任何威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 谁是“渡江第一船”

关于百万雄师过大江时哪一条船最先渡江成功，说法不一。王济生作为这一战役的直接参与者，曾撰文谈了看法。王当时在九纵 25 师 73 团。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决定，以 3 野中路集团第 7、9 兵团的 4 个军于当夜发起渡江战役。9 纵作为 9 兵团主力，担负起第一梯队突破江防的任务，73 团又是第一梯队里的第一梯队。

当夜 20 时 20 分，73 团指战员已大都登船完毕，整装待发。这时，上级派通讯员下达命令：“听命令开船”！可能是由于过分紧张激动，通讯员在传达到 73 团 1 营 3 连时，竟变成了干干脆脆的两个字：“开船！”漏掉了命令中的 3 个字。3 连 5 班的那条船在班长刘德翠率领下，“嗖”地冲了出去。旁边的船以为战斗已经开始，也纷纷划桨开船。3 连 5 班那条船一马当先。眼看就到达南岸。敌军发觉了。大炮、轻重机枪一阵开火。船老大中弹负伤，船头一扭，竟顺水向下流去。刘德翠一把抓起船舵，又把船转了回来。岸边是两三米高的土崖。刘德翠马上指挥大家下船架梯并率先登上了梯顶。全班同志接着登上了江岸，并占领了第一道壕沟和江边地堡。5 班按事先布置，打出了 3 颗亮晶晶的红色信号弹。他们的登陆时间是 1949 年 4 月 20 日 21 时左右，团部向师竞选的时间是 4 月 20 日 21 时 15 分（有案可查）。登陆地点在安徽繁昌夏家湖偏西。25 师 7 团 3 连 5 班应该是真正的“渡江第一船”。

## 四 A 电报

1949年3月，经过三大战役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被全歼。我人民解放军似滚滚铁流挥戈南下，直抵长江北岸。

为了与军司令部保持顺畅的通讯联络，及时报告战况和接受命令，4月17日，我军88师师部电台随付军长到达了距长江仅一公里的前沿观察所，将电台架设在掩蔽部里。

江南岸的敌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但他们不甘心灭亡，仍疯狂地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为了给那些吓破胆的士兵们壮壮胆，鼓鼓士气，他们出动了大批的飞机不分昼夜地在江面上盘旋，即使是风吹草动，也要胡乱地进行狂轰滥炸和疯狂的扫射。南岸的敌炮和在江面上巡逻游弋的敌舰，也不时地盲目向北岸开炮。敌人幻想着凭借长江天险，阻挡我军前进，以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

4月21日傍晚，师部电台报务员小刘和老杨坐在电台旁值班。忽然，一阵急促的跑步声由远而近地来到了掩蔽部。师部机要员小王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快！立即发出去！”说完递过了一份电报。小刘接过一看，“啊！四个A”——这是最紧急的电报，必须立即准确地发出去，稍有延误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小刘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是个沉稳老练的报务员了，他压制着紧张的心情，熟练地捺起电键进行呼叫，很快与军部电台联络通了。正当他要发报的时候，突然一阵刺耳的敌机俯冲声传了过来，随后一声巨响，敌机丢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在掩蔽部旁爆炸了。在爆炸的瞬间，小刘奋不顾身地扑向了电台，手里还紧紧捏着电报。爆炸过后，小刘艰难地从泥土中爬了出来，看到被自己用身体保护的电台完好无损，电报仍在手里没有丢，满是泥土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顾不得伤痛，立即带上耳机，转动度盘，并习惯地喊了声：“老杨，摇！”可是马达不响，小刘回头一看，只见老杨无力地扑倒在马达上，鲜血和泥土沾满了他那又黑又瘦的面庞。原来，在刚才的爆炸中，老杨的头部负了重伤。小刘快速替他包扎了伤口，擦去了脸上的血迹，将他安置在一边，准备去喊半里路外的其他同志。他刚要出门，就被刚刚苏醒过来的老杨叫住了：“小刘，发报要紧，我能摇。”说完，立刻摇起了马达，血水渗透了绷带，顺着脸颊缓缓地淌了下来。看着老杨满脸痛苦的样子，小刘的心里难过极了，但是，手里的特急电报一刻也不能耽误啊！他捺起电键作长时间的呼叫，然而，一遍两遍，始终联络不上，急得两人满脸汗水，眼睛都红了。

是什么原因呢？小刘脑子里闪过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某军电台天线被炸断的情景。难道天线被炸断了？想到这里，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果然不出所料，架设天线的竹杆被炸成了数节，拉绳没有了，天线也被炸飞了，只剩下很少的一截缠在树上。这时，天已黑了下來，可敌机仍在头上疯狂地俯冲扫射，敌人的炮弹也不时地在他们周围爆炸，两个人顾不得这些了，他们伏在地上东抓西摸寻找天线，突然，借着敌人炮弹爆炸瞬间的亮光，小刘发现一大段天线挂在了小树梢上。爬上去拿吧，树太小，乘不住人，在下面又取不着，为了能及时地把电报发出去，小刘和老杨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在猛烈的炮火中搭起了人梯，在爆炸的闪光中从容地取下了天线，并很快地接好。

当小刘再次呼叫时，很快就听到了对方的回答，这时，离发报的最后时限只差一分钟了，小刘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拍完了九十多组字的电报。

顷刻间，响起了山崩地裂般的轰鸣，大地在颤抖，天空在燃烧，我军强大的炮火，似狂风骤雨，在这份特急电报的指示下，准确地飞向南岸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大炮立即变成了哑巴，被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江防工事，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空。时间不长，我军各突击部队胜利登陆的信号，接连不断地划破黑暗的夜空，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时，付军长兴冲冲地来到了掩蔽部，激动地对小刘和老杨说：“电报发得很及时，我们的大炮已摧毁了敌人的江防工事，先头部队已胜利登陆了，你们赶快拆线，马上过江。他俩怀着胜利的喜悦，同电台的其它同志一起，携带电台登上战船，冲向江南，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 神奇的“瞎炮”

淮海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某炮团3连1班缴获了一门美式山炮，它虽然很高大威武，但缺少瞄准镜，就像一个没有眼睛的巨人，所以大家都管它叫“瞎炮”。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一班的同志们听了却很不舒服，全班人人都憋着一股劲，非要叫“瞎炮”长上千里眼不可。

渡江战役的前夕，全班同志开展了紧张的敌前练兵，他们想出了很多的办法来增加射击的准确性。首先，把别的班的瞄准镜借来，作为校对和修正“瞎炮”瞄准时发生的射角偏差，以便从中摸索操纵“瞎炮”的经验。在练习打活动目标时，又采取了调架尾跟踪追击的办法来增大射角。就这样，先用“瞎炮”瞄，再用瞄准镜去鉴定。在短短的一周内，全班就逐步掌握了“瞎炮”准确射击的规律。

4月21日黄昏，渡江战役打响了。因为“瞎炮”没有瞄准镜，所以没有领到打“点”的任务，只要它向敌人炮火密集的地带射击就行了。“瞎炮”在1班同志的熟练操纵下，打出的炮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连长一看“瞎炮”不瞎，立即命令1班攻打敌人的火力点。全班上下协调一致，利用平时摸索的经验和规律，调整射击角度，没有瞄准镜，就从炮筒子向外瞄准，试射的第一发就命中了目标。就这样，“瞎炮”射出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接二连三地把敌人的地堡送上了天。

22日拂晓，从安庆方向窜来了一艘敌人的汽艇，借着濛濛的江雾；在我满江的战船中悄悄地穿插而过，企图蒙混过关向长江口逃窜。上级命令一班对敌艇拦截阻击。面对逃窜的汽艇，班长激动地说：“同志们，是‘瞎炮’还是‘神炮’，就看这一次了！”战士们齐声喊道：“放心吧，班长，我们的‘瞎炮’有了千里眼，早就变成‘神炮’了。”“瞎炮”睁开了神奇的眼睛，对准逃窜的敌艇，高昂的炮口中喷出了一团火球，随着一声巨响，敌艇上冒起了浓烟，敌艇失去了平衡，像发疯似的，在江心团团打转。“瞎炮”！打得好！”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瞎炮”的第二发炮弹又在敌艇上开了花。艇上的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纷纷把艇上的东西往江中抛去，妄想以此来减轻艇的重量逃命。“瞎炮”发怒了，不停地喷吐着火舌，最后，敌艇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慢慢地沉入了江中，侥幸没死在“瞎炮”口下的敌人，也都像落水狗似的成了我军的俘虏。

战后的总结表彰大会上，1班被评为“渡江战斗英雄班”，“瞎炮”也被大家改名为“神勇的渡江英雄炮。”

## 占领南京

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某军奉野战军首长的命令，征尘未洗，马不停蹄地挥军南下，直抵长江北岸，准备强渡长江天险，解放南京城。

骑马行进在队伍中的某师宋政委，望着这支装备整齐、斗志昂扬的威武铁军，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从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开始，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就从战略防御转变到全面反攻，从几块狭小的解放区到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现在打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窝，很快就要解放南京城了，时局的发展快得出乎人们的预料。在渡江动员的高干会议上，野战军唐主任的讲话又在他的脑际中回荡：“三国时候，曹操带了83万人马攻打东吴，结果在横渡长江时遭到了全军覆没。现在，我们要来一个百万雄狮下江南，胜利的打进南京城，在历史上创造一个伟大的奇迹。”每当想起这些，宋政委就难以压抑激动的心情，恨不能立即打过长江去，解放南京城，解放全中国。

部队于4月中旬抵达了与南京城隔江相望的江浦县城和浦镇以北地区。稍事准备后于4月21日凌晨以两个师的兵力向浦县城和浦镇的江北守敌同时发起了进攻。在强大炮火的轰击下，经过两天多的激战，除部分逃窜过江外，其余守敌全部被歼，于23日上午占领了两浦地区。

敌人为了阻挡我军过江，在南逃时，除了带走部分船只外，将江北岸的所有船只全部烧毁。又怕我军渡江夺船，所以也烧毁了南岸的船只。望着赖以生存的渔船在熊熊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乡亲们悲痛欲绝，嚎陶大哭。看到敌人的兽行，听着乡亲们的哭声，战士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跨过长江消灭这些残害百姓的禽兽。但是，面临着宽阔的长江天堑，没有船只是跨不过去的。找船成了指战员们的紧迫而首要的任务。战士们沿着江岸到处找船。师侦察连班长杨虎带领六名侦察员，每人两颗手榴弹，一支短枪，在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冲过翻滚的浪涛，悄悄地登上了南岸，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带回了一条尚未被烧毁的小轮船。

部队在搞到部分船只后，当晚就利用夜暗的掩护，开始了分批分次的渡江，先头部队登陆后迅速消灭了岸边守敌，占领了红山、紫金山的最高峰。由于我两侧的兄弟部队已先期渡江，正在向南京逼近，南京的守敌怕遭到我军的围歼，所以其主力已弃城逃窜了，我军先期渡江的几个团没有遭到敌人顽强的抵抗便冲进了市区，先后占领了总统府、狮子山、清凉山、光华门外飞机场、市中区和中山门城外高地等。当4月24日清晨，太阳慢慢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古老的南京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当我军前卫团以巷战的姿态插进市中心的时候，流散的匪徒，还不时袭击，忽而从楼上扔下手榴弹，忽而从窗口射出子弹，整个南京城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彻夜未停。针对这种情况，军首长及时召开了各师指挥员会议，研究制定了肃清残匪、维持秩序的作战计划。在地方党组织和工人、学生的密切配合下，剿匪工作顺利完成，短短几天，南京市里的散匪基本上全部肃清，活捉数千人，缴获枪支万余支。人民群众看到城市秩序良好，解放军纪律严明，他们从心里拥护共产党，爱戴解放军，部队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欢迎的群众。当大部队入城时，人民群众夹道相迎，有的使劲鼓掌，有的和战士们握手，路旁的楼房上，有不少的窗口探出了拥挤的人头，射出欣喜、惊

奇的目光，挥手向人民的军队致意。人人都为南京的解放而惊喜万分。

南京解放了，它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正式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

## 蒋介石险些被活捉

这是一个真实的、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悲壮的历史故事，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内部秘密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触即溃，45万国民党军闻风而逃，他们曾经吹嘘的“共军要过长江，必然遭致曹操80万兵马下江南的命运”的神话，迅速破产。23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解放，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4月24日，住在溪口的蒋介石，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惶惶不可终日。这天，蒋介石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叫到跟前，给他交待：“把船备好，我们明天就走。”到哪儿去，他并没有说。蒋经国也没有问，因为他深知父亲的脾气，尤其是这个时候。于是，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准备船只。同时，将自己的俄国妻子送往台湾，并着手处理后事，以便作永别大陆的准备。

翌日，蒋介石带领蒋经国一大早来到溪口北面的飞凤山，向蒋母墓地告别。然后离开溪口，乘车直奔象山港，登上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泰康号”军舰。舰长黎玉玺请示：“开往哪里？”“到上海去！”蒋介石阴着脸脱口而出。

此语一出，惊得黎玉玺和站在旁边的蒋经国，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此时的上海危在旦夕，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直逼上海市郊，成包围之势。这时候去上海简直是送死！二人马上劝阻。但无奈蒋介石决心已定，执意要去上海，亲自指挥“保卫上海”战役。

为什么蒋介石要冒险来上海督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他发迹的地方，长期以来国民党政权一直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可谓对蒋有恩；从现实利益看，存放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外币、珠宝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尚未全部抢运到台湾，这是他将来继续反共的基础和本钱；从战略上看，上海是国际大都市，英美等国在上海有巨大的投资，可能由此得到他们物质、军事上的支援，使之成为国际问题，最后依靠国际的力量来解决。因此，蒋介石想作最后的挣扎，决心亲自到上海去督战。

于是，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听汇报、作指示，开谈话会，企图笼络派系，重振军心，与共产党在上海“决一死战”。5月1日下午，蒋介石在复兴岛团以上军官训话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嚣：“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都是完全做对了的。北伐，我们是在困难中进行的，排除了困难，获得了成功。西安兵变，是我生平最险恶的一关，也是党国存亡的关键，这一关我们也度过了。抗战，我们没有来得及充分准备，以后外援又被截断，那时处境多么艰难，然而经过八年奋斗，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在战略上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这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现在比起我们以往来，困难要少得多，大家要相信我，应当有充分的信心。”话虽这么说，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势如破竹，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清楚的。

复兴岛虽然安全，但远离市区，有许多不便。蒋介石提出搬到市区去，靠前“指挥。”蒋经国急得上火，劝阻说：“时局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共党活动猖獗，危险万分，父亲怎么可以搬进去住呢？”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厉声说：“危险！你知道，难道我不知道！”蒋经国看父亲决意要搬，也不敢违抗，只得搬到金神父路的励志社去住。但是，为了确保蒋介石不出



意外，不时地在复兴岛，或者军舰上过夜。

蒋介石搬进励志社后，每日找人开会，谈话，研究防务，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为“保卫大上海”而煞费苦心。担任保卫蒋氏父子的国民党宪兵、特务也是戒备森严。然而，就在此时，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蒋介石周围张开……

蒋介石到上海后的一举一动，很快引起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密切注意。三大战役结束后，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上海地下党把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占上海作为战略任务，紧张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天深夜，中共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身着便衣，秘密来到虹桥公墓，与等在那里的王亚文、张权，共同研究制订了一项绝密计划：准备以张权为核心，在上海市区组织武装起义，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蒋介石父子予以活捉，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进城。沙文汉神情严肃地对王、张二人说：“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埋葬蒋家王朝的一项重大行动。”这次行动计划是：将刚从青岛开来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军舰的舰长争取过来，在黄浦江狭窄之处把军舰炸沉，封死蒋介石乘坐的“永兴号”退出黄浦江的水路。然后，由张权亲率一部精兵，强攻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配合解放军，活捉在复兴岛上指挥作战的蒋介石。

张权，原名张寿芬，字栩东，1899年9月13日出生于河北武强县张家庄，1917年考入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炮科。回国后任过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上校科长，北伐时，先在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任第19师少将师长，后又兼任第56团团长，在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的战斗中，张权立下了赫赫战功。1937年，从陈调元部第46师上校参谋长调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研究员兼机关炮训练班主任。抗战爆发后，张权受命组建了国民党机械化装甲部队，被誉为中国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创始人。1941年，晋升为国民党战车防御炮总队中将总队长，下辖8个摩托化团（相当于师）。在名闻中外的滇缅会战腊戍战役中，张权所辖战车防御炮队配合中美两国军队作战，一天之内击毁日军坦克40余辆。因此被誉为抗日名将。抗战胜利后，就任国民党参谋总长的陈诚，下令撤销战车防御总队编制，张权被免职，成了一个空有中将头衔的闲人。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溧阳路麦加里38号一幢普通楼房里，过起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听说张权回到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组组长的王亚文，立即赶来找他。

说起王亚文，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名老党员，并且是一个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颇具神秘色彩的人。早在1924年就参加革命，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941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将王亚文介绍给时任国民党战车防御炮队中将总队长的张权当上校秘书。王、张二人朝夕相处一段时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现在，他被董必武派到上海来，主要是在沙文汉的领导下，做国民党上海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故知再遇分外亲。张权见王亚文登门，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情地问候。

王亚文听完张权对自己遭到蒋介石集团不公正待遇的叙述后，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说：“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不仅要置你于死地，

而且把千百万中国人民拖进内战的深渊，使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蒋介石专制集团进行斗争，才能救国家人民于水火，我们个人也才能找到新的生路。”接着，王亚文向张权分析了时局，指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维持不了多久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只有认清形势，脱离反动集团，向人民靠拢，才有光明的前途。”张权听了王亚文的分析，深表同意，并且热切地希望能参加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

张权渴望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早在重庆时就有了。他曾在重庆与董必武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救国要靠共产党，抗日要跟共产党走，做人也要做共产党那样的人！”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就向王亚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当时，董必武指示，张权不加入共产党，比加入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对我们的工作更有利。因此，曾派王亚文向张权做说服解释的工作，并以党的名义正式通知张权“共产党是了解你的，希望你在国民党军队中起更大的作用。”

旧话重提，王亚文马上答应向上海地下党汇报。同时，希望张权能在上海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在蒋介石心脏里埋下一批定时炸弹。张权神色庄重的接受了地下党交给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今天，沙文汉、王亚文和张权三人会面，就是听取策反工作汇报，详细制订上海起义、活捉蒋介石的行动计划。最后，沙文汉强调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时机。我们要根据整个上海战役的进程而定，只有步调一致，相互呼应，才能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蒋介石必将为我所捉。”

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为实现这一计划，张权等人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日以继夜的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权根据分工，利用中共地下党为他争取到的“太湖警备司令”和“国民党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官”的合法头衔，周旋于国民党营垒之间，先后做通了国民党51军军长王秉钺、37军209师师长方懋锴、团长乐在中、原李延年兵团一纵司令李锡佑、182师师长王挽危，以及机械化摩托团团钟勉、机械化炮团团刘钟泉等人的工作，他们表示响应起义。此外，国民党空军、海军的工作，特别是这次行动的重点吴淞口驻军的工作，也已基本做好。

酝酿多日的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并活捉蒋介石的行动，很快就要开始了，起义的枪声，即将在上海打响。

一天，沙文汉召集秘密会议，传达上海地下党决定：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逐一宣布了具体计划。之后，沙文汉说：“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敌人已如瓮中之鳖。据地下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于5月7日悄悄离开了复兴岛，听说随时可能回来。他叫蒋经国留在上海督战。由于陈仪和我党联合起义，被汤恩伯出卖，蒋介石已对汤不放心，强令汤将家眷送往台湾作人质，汤恩伯随时可能逃跑。我们要抓紧时间，迅速组织起义，里应外合解放上海，能活捉老蒋固然好，捉不到老蒋捉住小蒋也行，即使捉不到，也不要紧。我们的目的是加速上海解放，使这座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历史将记载下这辉煌的一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件突然出现，终于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5月13日，按照事先约定，张权派自己的侄女婿、国民党虬江路仓库主任秦然轩，携带李锡佑将军的亲笔密信，去找国民党132师情报科科长张贤，并约请其见面。

李锡佑原是国民党李延年第六兵团司令部第三处少将处长，后来兼任其第一纵队司令。部队溃退上海后，第一纵队改编为132师，但李锡佑被免去了司令职务。尽管如此，李在132师尚有一定影响。考虑到132师驻扎在江湾一带，在整个起义中处于重要地理位置，经李锡佑提议，张权同意，决定通过李锡佑的知心朋友张贤，把132师争取过来。

第二天早上，李锡佑和张贤在北四川路上的新雅饭店会面。张贤到后，李锡佑先问了132师最近的动向，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请他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策动该师起义，并给他讲了当前的局势。对此，张贤不仅没有异议，而且积极附和，表示答应。

15日下午4时许，张权从吴淞炮兵司令部邵百昌处做争取工作返回，刚走到麦加里弄堂口，就远远望见自家二楼阳台上，挂着一件耀眼的红衣服。不好！这是出事的信号。张权回身拔腿就走。可是已经迟了，早已守候在这里的一帮国民党特务，像虎狼一般猛扑过来，将张权抓住，推上停在那里的一辆吉普车，直送市警察局。

原来，昨天李锡佑与张贤会面后，又和负责132师两个营的梅玉藻、张贤见了面，布置他俩带部队起义的事。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两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回到师部后，感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主动向师长邓朝彦告了密。邓大惊失色，立即报告了汤恩伯。遵照汤恩伯的命令，第二天，邓朝彦就派张贤带了4个特务，开了一辆吉普车，来到麦加里弄堂口守候。上午8时左右，他们在这里抓住了从张权家出来的秦然轩。然后又在李锡佑家里抓走了李锡佑。尽管张权家人发现秦然轩被抓后，在阳台上挂了红衣服报警，但张权还是没能逃脱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这一天，是预定起义的前一天。

历史的长河往往有着许许多多的迂回曲折，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张权、王亚文等人长期酝酿和准备的地下军起义，一次准备里应外合解放上海、活捉蒋介石父子的伟大义举，就这样功败垂成，令人惋惜地流产了。

张权等人被捕后的7天里，受尽了残酷的审讯折磨。张权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始终坚贞不屈，像青松一样巍然屹立。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他一字不吐；国民党军中爱国官兵的名字，他一个不讲。反而，向同室难友讲他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交往的故事，赞扬解放军的英勇善战。他说：“国事至此，我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鬼雄以击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能以死报国，是值得的。但如果我能活着了去，就要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些肺腑之言，充分表达了张权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一个国民党将领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崇高的气节。上海地下党虽经多方设法，但仍未能营救张权等人出狱。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在上海举兵活捉他，气得浑身哆嗦，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立即下令杀掉张权等人。汤恩伯一点不念及昔日老上司、老战友的情面，终于下了毒手，亲自“核准”将张权、李锡佑枪决。

5月21日下午6时，张权、李锡佑在南京路光荣就义。行刑前，国民党宪兵强迫他们跪下，他们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用尽平生之力，奋力高呼：

“胜利属于人民！”

“共产党万岁！”

这声音，犹如春雷，掠过长空，掠过大地，在上海市民的耳畔久久地回响着……

## 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1949年5月初，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3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领3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8个军，25个师，加上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共约20万人。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

汤恩伯妄图依仗其先进的武器装备，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他将其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3至6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饭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32座建筑物。

整个上海，仅钢筋水泥的碉堡，就有4000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3个守备区。

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重点是浦西市郊藉以保障吴淞和市区，旨在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筋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和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3公里的防御地带。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

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3野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完整地接管过来。

显然，这是一道难题。

从此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三种方法可选择：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军也围不死。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粟裕、张震选择了后者。

为了不打烂城市，粟裕、张震对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粟裕于5月10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

兵力部署是：以第9、第10两个兵团指挥8个军（以后又增调第23、第

25军配属给第9、第10兵团)及特纵炮兵一部,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

两个兵团的任务分别是:

第10兵团的第28、第29两个军攻占宝山、吴淞;第26军攻占昆山、安亭;第33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9兵团围攻上海。

第9兵团的第20军攻占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通路;第30军、第31军向浦东挺进,协同第10兵团钳击吴淞;第27军集结嘉善地区。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10兵团围攻上海。

粟裕是战役指挥的高手,由上述不难看出,此部署可谓环环相扣,有条不紊。

经过第一阶段10天的激烈战斗,除吴淞口尚未完全封闭外,第9、第10兵团已从东、南、西三面紧紧包围了上海汤恩伯集团。

战役第二阶段为总攻市区,全歼守军。

3野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依据战况的发展及市区的设防情况,决心先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集江湾地区的汤恩伯集团残部。并决定增调第7兵团的第23军、第8兵团的第25军及特种兵纵队的炮兵第1、第3团各2个营、第2团、战车团,分别支援和协同第9、第10兵团作战。特种兵纵队所属部队由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统一区分部署。

粟裕、张震对总攻上海市的作战进行了周密部署:

第一步,全歼浦东守敌,控制黄浦江右岸,组织炮火封锁守军的出海通路。为此,第9兵团以第30军、31军全力迅速攻歼高桥地区守军,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黄浦江面,切断守军海上逃路。以第20军主力攻歼浦东市区守军。其余各部完成对市区攻击准备。

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外围阵地,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守军的包围。为此,第10兵团以第25军、29军全力攻占吴淞、宝山并控制江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吴淞口,与黄浦江右岸部队沟通火力联系,切断守军海上逃路,并严防其海军舰艇袭扰;以第28军、33军、26军分别楔入吴淞、江湾、大场、真如之间地区,割歼当面守军,并向纵深发展。第9兵团以第27军、23军及20军主力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力求楔入守军纵深,将其分割歼灭之。第30军、31军除加强沿江、沿海之警戒外,并以必要的炮火支援黄浦江左岸作战。

第三步,聚歼可能退缩到以江湾为中心地区的敌守军残部,达成攻占淞沪全区的目的。

这时侦知,敌人拟从海上撤逃。其第54军已从真如地区撤走,苏州河以南市区,仅有交警总队守备。

粟裕当即命令各部同时实施攻击,迅速全歼上海市守军。

25日上午8时,仅仅经过10多个小时,苏州河以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南部市区打得如此顺利,谁也没有料到。

但一条窄窄的苏州河,却把我军的攻势挡住了。各部从拂晓一直攻到中午,也没有攻过河去。

为了把上海从敌人手里夺取过来,完好地交给上海人民,三野和军党委早就下达过“禁令”:在上海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陈毅司令员也特别强调指出:“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苏州河宽约 30 米，横穿上海市区，这一带地形，对我军攻击部队非常不利。

敌人凭藉北岸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居高临下，交织成稠密的火力网，封锁住整个河面和南岸的一条宽阔马路。每座桥头都构筑了碉堡，并配备有坦克、装甲车巡逻。尤其在黄浦江畔的外白渡桥，敌人从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上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

我军攻击部队，为了早日解放上海，冒着枪林弹雨往上冲，但是，一波一波冲上去，一批一批倒下了。在他们中间，有创造“济南第一团”荣誉的干部、战士，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长江第一船”战斗骨干。在苏州河畔，他们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指战员们被敌人的疯狂和凶残激怒了，一个个胸中燃烧起复仇的烈火。面临感情和理智的激烈碰撞，感情战胜了理智，心理的天平出现了严重倾斜。

这时，有的部队不顾一切，死打硬拼，结果反而造成更多的伤亡。有的部队已经把榴弹炮营从郊区拉到外白渡桥。几十门火炮的炮口，齐刷刷地对准百老汇大厦，他们要把敌人连同百老汇大厦一道，从上海地图上抹掉。

27 军军长聂凤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严令制止：

“谁敢放一炮，我撤谁的职！”

愈来愈多的同志头脑冷静下来，理智重新占了上风。也想出了更好的对策：

在军事上改变战术手段，在苏州河正面佯攻，将一部分主力，在天黑后从侧面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攻击，抄敌人的后路。

同时，派人尽快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确保城市完好。

这时，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这时已逃离上海。敌第 51 军军长刘昌义临危受命，被任为淞沪警备副司令。于是，经过地下党策反和 27 军的军事压力，刘昌义率部投诚。

经过英勇奋战，上海人民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

## 出色的战时政治工作者——唐亮

提起“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句响亮的口号，人们就会想起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唐亮将军。

唐亮，原名唐昌贤，又名唐昌明。1910年6月13日生于湖南浏阳永和镇上街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初，参加浏阳农民赤卫军；7月，随浏阳工农武装参加支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政治训练队学习。1930年底，唐亮从政治训练队毕业后不久，担任了红八军第二师师委秘书，并当选为师委委员。从此，他步入了我军政治工作者行列，开始了长期的政治工作的实践和探索。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唐亮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陈毅等直接领导下，转战华东、中原等战场，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方针政策，在领导和组织部队战时政治工作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模范政治工作者。”

在长期的政治工作实践中，唐亮把教育部队特别是高级干部认清斗争形势，深刻理解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完成作战任务的重大意义，作为达到政治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军事行动上的协调一致，增强胜利信心的首要任务来抓，使之成为夺取胜利的强大思想动力。

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2月，华东国民党军虽然在苏中、宿北、鲁南等战役中遭到重大打击，但仍在继续调兵遣将，攻势并没有完全被遏制。此时，国民党军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由其参谋总长陈诚亲自指挥，从南、北两线出动，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一死战。在南线，集中8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铁路东段至台儿庄一线，分三路向北进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在北线，由其第2绥靖区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9个师为辅助突击兵力，从胶济铁路南下莱芜、新泰地区，实行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2月上旬定下决心，集中主力隐蔽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

唐亮不仅参加了这次鲁南战役决策的研究，而且还负责领导这次战役的政治工作。他要求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贯彻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思想，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打烂坛坛罐罐，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消灭更多的敌人。各部队昼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形式，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华东野战军各部队在六七天的连续行军之后，紧接着进行了3昼夜的激战，将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余人全部歼灭。这次胜利，加深了广大指战员对运动战、歼灭战重要性的认识，使原来那种“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等消极、悲观、埋怨情绪一扫而光。

唐亮善于对政治工作研究，从实际出发来贯彻上级的指示。1948年2月17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连队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便使新式整军运动中的民主生活转向正常。唐亮和陈士榘学习总政指示后，认为这样做对连队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当时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和红军时期的



情况已大不一样，再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容易被误解。于是，在同年3月，唐亮亲自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建议将连队士兵委员会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并在全军实行起来。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唐亮在这次战役的筹划和决策中，亲自起草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攻打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这个提法，是野政工作组下部队回来汇报时，谈及某部一个班长在兖州战役后对下一步应打哪里的看法。善于吸取群众智慧的唐亮，把这个战士的看法加以完善，把战役目标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战役动员口号。由于这个口号深入人心，把当时参战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支前民工都动员起来，化为巨大的力量，自觉地为实现这个战役目标而奋斗。攻城部队的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像“济南第1团”、“济南第2团”等大批英雄模范单位和人物，第3纵队第8师师长王吉文，第13纵队第37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等数以千计的指战员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而英勇献身。打援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修筑了一道又一道的坚固防御阵地，使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望而生畏，眼看着济南被攻陷而迟迟不敢北援。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不仅踊跃支援前线，还布下了天罗地网，捕捉零散潜逃的敌人。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装成病人躺在牛车上，逃到济南东面的寿光县，又被公安战士查出捉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已逃至徐州以北离国民党盘据的临城（今薛城）不到12里路的地方，被我军侦察人员捉获。第2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装成难民逃至离青岛不远的高密，被民兵捉获。由于参战部队和广大支前群众的共同努力，使“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变成现实，战役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瓦解敌军，溶化俘虏，争取、改造解放的国民党官兵，是唐亮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当时，部队战斗频繁，伤亡减员大，如何解决兵员补充，是保证部队持久作战的一个大问题。唐亮从战争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从解放区动员民兵、贫苦农民参军参战，难以满足部队大兵团连续作战的需要。他认为，应对自动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士兵，进行争取教育和改造，使大多数解放战士迅速地补充到我军部队，特别是经常保持战斗连队的满员，是保证部队能持久作战，加速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因素之一。为此，唐亮根据瓦解敌军的原则和军委、总部的指示精神，在1947年1月2日，即鲁南战役发起的那一天，主持制定了《山东野战军关于处理俘虏官兵的决定》，明确规定各部队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在经过短期的审查、教育，激发其阶级觉悟后，就可以补充部队。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野战军政治部之下，设立了庞大的俘虏管理处，各纵队也建立了相应的俘管机构和临时俘虏管理机构，具体进行教育、改造俘虏的工作。当时，部队普遍采用诉苦教育的办法，来教育、改造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由于很多国民党军士兵是抓丁、抽丁被逼着来的，加之国民党军官兵不平等，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是家常便饭，因而很容易激发起他们的阶级觉悟。许多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通过诉苦教育，耳闻目睹，认清两种军队的根本区别，以替蒋介石卖命为耻，以当解放军战士为荣。这些被解放的国民党军士兵，懂得为谁打仗的道理后，纷纷自觉地掉转枪口，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勇敢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因而解放战士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

源。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成立了特种兵纵队，就是由解放过来的坦克兵、汽车兵，驾驶着缴获的美制坦克、吉普车、大卡车、奔驰在前线和后方的；火炮由解放过来的炮手操作、将炮弹射向敌方的。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瓦解敌军工作的成功。在莱芜战役激烈进行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韩练成同华东野战军派遣至该部的敌军工作干部研究后，在李仙洲集团突围前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不仅使原定突围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两小时，而且使46军在关键时刻因找不到军长，失去指挥，群龙无首，军心涣散，从而加剧了李仙洲集团的覆灭。

在那以后，华东野战军瓦解敌军工作继续取得新的成绩。在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1个军两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他们对这些战役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唐亮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教育、改造俘虏工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鉴于大规模战役持续的时间长，兵员补充要求的时限紧、数量多，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军士兵知道蒋军必败、解放军必胜的道理和士气愈来愈低的情况，于是将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先进行审查、再进行教育，然后才逐步补充部队的做法，到淮海战役时，改为随俘、随补、随教、随打。很多解放战士头一天被俘虏，第二天就参战，有的光荣负伤，有的英勇牺牲，有的立了战功。在整个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各部队稍加教育就直接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在10万以上，加上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从而使部队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兵员，保证了连续战斗的进行。出色的俘虏工作，使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源源不断，愈打愈强，愈打愈多。在连续、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部队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在军队历史上是少见的。

唐亮把教育部队遵守纪律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1947年夏秋期间，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到鲁西南地区，转入反攻作战。这个地区比较贫困，加之当年洪水泛滥，就地筹集不到粮食，而后方又运不来，部队供应困难。唐亮多次向各纵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们打招呼，要求他们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教育部队自觉地遵守政策和纪律，决不能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决不能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声誉的事情。他自己所在的领导机关，由于常常搞不到吃的东西，不得不饿着肚子来指挥作战。

同年9月底，唐亮随军跨越陇海铁路，进至豫皖苏边区，执行参加开辟中原解放区的任务。唐亮针对当时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普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土改政策，把土豪劣绅的财物分配给基本群众，要很好地调查研究，摸准情况，不能把中农当成地主、富农。这就避免和减少了过火行为。他还根据当时缴获比较多的情况，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制度，领导有关部门将在河南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地缴获的物资收集起来，有的就地补充部队，还将不少汽油、炮弹等物资运送到黄河以北的后方储存备用。这些，对当时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群众称赞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1948年3月，在洛阳战役前，唐亮特别要求参战部队，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并作为对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效的一次检验。各级领导抓紧检查督促，干部战士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因而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状

况良好。

1948年冬，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道进行淮海战役，部队进到新区作战。唐亮根据全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要求部队树立主人翁的思想，认真遵守政策和纪律。他特别强调在新区城市，人民政权尚未建立，物资供应不便，生活习惯又不一样，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的情况下，更要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9年春天，第3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准备渡江作战，唐亮在抓渡江动员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部队应遵守党的城市纪律和新区政策。他还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大指战员进入城市和新区后必须遵循的事项，用简明通俗、易懂易记的文字，编成《约法八章》、《入城守则》、《新区农村工作手册》等文件，以第3野战军政治部的名义，于当年3月印发部队。随着这些规定的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对第3野战军顺利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搞好接管，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9年5月上旬，唐亮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指示，在江苏省苏州市附近的木渎镇，主持召开接管城市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加强城市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教育。他根据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情况，特别要求各部队教育指战员爱护公共财物，保护人民利益，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谦虚谨慎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由于入城教育搞得深入细致，第3野战军各部队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宁肯露宿街头也不住民房，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做到“一尘不染”，涌现出不少“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连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唐亮抓战时政治工作的成效，突出表现在广大指战员战时杀敌立功的行动上。华东部队的战时立功运动，早在194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单位开展起来了，唐亮组织专人认真总结了立功运动的经验，在部队普遍推广，组织开展立功创模竞赛，由杀敌立功，到战勤各项工作都可以立功，发展到“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对作战和战勤成绩卓越的，采取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相结合的方法，评为战斗英雄、模范或立功。从而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人人以立功为荣，争取当英雄、当模范。从1946年到1949年中，华东军区、第3野战军各部队共涌现出战斗英雄1163名，各种模范2.7万多名，立功的56万多人次。立功创模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卓有成效，是华东部队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成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作战和各项任务完成的有力保证。

